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0月31日第25期 总第20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3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十四）

中国人民大学专辑（下）

【专稿】

尚晓援 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

【怀人】

孟小灯 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陈 原 祖母，你因何受难

【述往】

卫兴华 我成了叛徒、特务

林俊德 我在文革中是怎样闹革命的（下）

【口述】

张林南 口述 吴淮阳记录 我是个“保郭派”

【文摘】

冯其庸 看尽惊涛起落时——文革记事

宋 涛 在“运动”中如何保持清醒头脑

方汉奇 “四清”归来，我直接进了“牛棚”

高 放 漏洞百出的大批判

【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时期部分死难者简表

【本刊声明】

【专稿】

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

尚晓媛



我的母亲阮季，1968年12月15日自缢身亡。从她弃世至今已经49载过去，即将半个世纪。母亲离世之后，我从来没有为母亲专门写过片纸只字。然而，这么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这却是内心一个未了的情结。

其实，在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罹难者中，母亲仅是其中之一，在（我的母亲阮季）百度搜索里，她的名字只有和我的父亲尚钺相关联时，才能看到只言片语。但是，每一个母亲，都永远活在她的孩子们的生命延续中。母亲和我血肉相连，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栩栩如生。母亲离世在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将伴我终生，永无痊愈之日。在父亲，舅舅，老一辈亲人相继去世之后，可以共享这份沉重思念的，只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

2008年12月15日凌晨，我弟弟尚小卫发出一封邮件，其中写道：

“亲爱的姐妹，你们还记得40年前的这个凌晨吗？40年了，我一直以为时间会抹去一切。但是，我错了，我永远忘记不了1968年12月15日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那天的一切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随时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谁都不知道，40年前的这个凌晨，我们的母亲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曾经走到我们床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后来知道，她走了，她选择了离开我们，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母亲不是名人，去世之前，相夫教子的家务颇重，加上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她从未获得过安静的学术研究条件。她在学术上的建树尚未成熟，家中留下的多是读书笔记和调

查记录。如果没有因政治迫害而导致的愤然离世，以母亲的聪慧和她早年在燕京大学所受到的系统训练，焉知母亲不会在后来社会学复兴的年代中，成为颇有建树的学者？

我最早学的是中国经济史，但是后来因为多种机缘，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当我翻拣母亲的文稿，发现母亲当年在川西所做的儿童调查问卷和笔记时，真是感觉到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有意继承父亲历史学研究的衣钵，却无意中踏上了母亲作为先驱者所走过的儿童保护之路。

在颠沛流离中求学

母亲原名阮怀昀，1920年出生于一个客居北平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籍为安徽合肥的阮姓人家。我的姥姥是苏宝琼；姥爷是阮永樾，字性白，他们住在后牛肉湾胡同一号，那是个有五个套院、几十间房子的大宅院。母亲出生的第二年，姥姥便去世了。为了照料子女，姥爷再娶。大革命前夕，北方政局不稳，生活便逐渐困迫起来，房子也越住越小。

在小学中学时，母亲读书很刻苦，成绩优异。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她和她的二哥寄居在他们的舅舅家中，一应开支由舅舅供给，直到进入大学。

母亲参加了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考试，结果，成绩优异，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还都获得了奖学金。在燕京大学，母亲考取了最难考的医学预科，实际这就是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是八年制，三年预科在燕京。



面对国难，燕京大学的同学当时有两种选择：或是离开北平参加抗战，或是在沦陷区继续学习，当然也有人计划去游击区参加共产党。当时燕京大学的校方还是希望同学（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的阮季们继续学习。母亲回忆，校长司徒雷登根据他的观感，【前排中】，摄于燕京大学校园）认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最需要的是人才，燕京大学的同学最好完成学业到大后方去。同时，

他以为同学们年轻，认识不清楚，很容易因社会的一般黑暗情况而深感失望，如果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到游击区去，则会使中国的情形更为混乱。在这些不同的倾向中，刚刚20岁出头的母亲十分犹豫。

不过，事态的发展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选择余地。珍珠港事变后，美日宣战，燕京大学于1941年12月8日被日本人占领，很多学生和教授被捕，两个月后，母亲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母亲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思想：

“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国家多难期间度过的。从“一二九”开始，直到珍珠港事变，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熟知的同学参加革命，而我却直到毕业的那一年，和这些活动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都是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评论和同情的。”

母亲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对政治和党派不感兴趣。她的主要想法是认真学习，埋头苦干，洁身自好。但是，正值多事之秋的中国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洁身自好的空间。在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之后，母亲不得不南下。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协和大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五所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汇集，将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和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母亲等几个先来的学生就在华西协和大借读。在颠沛流离之中，母亲对社会学逐渐产生了很浓的兴趣，而她读过的《社会学导论》的作者正在这里任教，于是，母亲便转入到社会学专业。

在华西协和大学的半年，母亲参加了成都慈善团体的调查活动。她认为自己很幸运：“这些调查帮助我明白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怎样做研究。”其后，母亲还参加了基督教会主办的边疆服务团。服务团的参加者大多是流亡学生和各大学的教授，分宗教、社会、生物、地质、畜牧五组。当时，任教的教师中有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李安宅，母亲和一些青年朋友常借他的家中开会。

李安宅以训练、研究、服务的口号，号召青年人下乡，参与边疆工作。母亲参加的那个调查组用了两个月徒步旅行，去各山寨考察。母亲看到各阶层的生活，许多过去听到的故事都变成了现实。20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人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这些落后的农村使母亲对文化教育有了新的看法。



调查回来时，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已经开课，既有沦陷区来的老同学，也有新招的后方学生，还有四川本地人。燕京大学校园中，社团生活非常活跃。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社团比较自由，不受干涉。母亲也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叫 Nowel，是圣诞节的意思。母亲在自己的社团中承担了组织社会工作的任务。她看到学校后面的天灯巷里主要住户都是卖破烂的，儿童生活在拥挤脏乱的环境中，于是就以这样的社区为中心，开展工作，锻炼自己。每天放学后，同学们轮流去给孩子们点眼药，发豆

（母亲【前右一】与同学留影）代乳，作家庭访问。

开始时，开展工作很困难。儿童的家长对大学生们的行为不理解。他们以为这些大学生是多事。后来因为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孩被带到医院，看了病吃了药后好了起来，他们因此改变了态度，对大学生越来越欢迎。大学生走过时，孩子们经常喊老师。这更激发了母亲和同学们的热情。由于豆代乳不能长期供给，母亲还发起募捐。在这样的工作中，母亲觉得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因为亲人在重庆遇上麻烦，母亲又来到了重庆。在重庆，母亲在一家《新世界月刊》找了份差事暂时糊口。她的收获就是有空整理了研究结果。母亲说：

“我把边疆的材料整理出一篇《从嘉戎杂居看戎民族社会组织》。因为过去都以为嘉戎无姓，而我这一次考察发现他们的房名相当于汉族的姓。根据这样的组织线索，是可以追求下去的，我以为这是很珍贵的心得。这一篇文章用人类学的功能方法写成，寄给李安

宅先生，自己很胆怯，他却很快回信说结构、材料和方法都很好，叫我寄到《边政公论》去，还寄来一封介绍信。这使我增加了信心。”

抗战胜利第二年，燕京大学迁回北平，母亲则在农村过了一个夏天，为边疆工作指导所工作，记录农民的歌谣，还做了一些语言学的记录，收集了大量民歌和故事。边疆工作指导所的经费有限，无法解决生计，正好这时华西协和神学院社会服务处主任到西康去了，母亲便接替了他的职位。

社会服务处的服务区域是成都南门外的贫民区。服务处每天下午施诊，上午给失学儿童开办两个识字班，另外还随时做一些救济工作。母亲到任后的那一个月，发生过两次火警，有一次烧掉200多户。母亲到受灾区调查以后发现，受灾民众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于是就发动神学院的同学捐助衣服。

母亲不反对宗教，却不愿参加每日三次的祈祷和布道，因此暑假时又去重庆实验救济院。救济院设在乡间，只有数年的历史，是国民政府在重庆时特地设立的，占地350亩。院长魏永清是燕京大学校友，母亲入燕京大学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和鼓励。母亲读二年级时，他去美国学神学。他是个农家子弟，由教会资助读完大学，人很热情、爽直，在燕京大学还当了一阵教务长。

母亲在慈善事业中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得到了很大乐趣。在救济院时，救济院长的一位美国同学所在的大
学Lindenwood College为中国女生设立了三个奖学金，
经此人介绍，母亲得到了这个奖学金。但是那边只管返
回的路费，而去的路费则要自备。母亲为了筹措路费，
就回到了北平。



（1949年华北大学，前右一为阮季，后右三为陈伯达）

此时东北军事局势已经很明显，华北很快也会改变颜色。在北平，她先在女青年会做了一个月的干事，又到天津参加了天津儿童急救会的工作，同时申请中美教育基金会的旅费补助，并准备护照和体格检查。但很快，天津就解放了。出于对新中国的憧憬，她

在华北大学第一天招生时便跑去询问了一番，但是对于共产党还是不大了解，又因为必须持介绍信，再加上对团体生活有些恐惧，所以迟疑了许久才去报考，1949年五月中旬，她终于入学。

进入华北大学后，母亲得以和父亲尚钺相识，她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社会学研究和 Learning 在中国很快就被禁止，母亲只好改为研究世界历史。

甜水井，温馨的记忆



我出生的地方，是鸭儿胡同三号，在北京的后海附近。2005年，我和姐妹们一起回去过几次，想寻找当年的记忆，但是这里已经变成了旅游区，热闹非凡。鸭儿胡同三号也已被拆，变成了一个大地，旧时的痕迹荡然无存。

（父亲尚钺和母亲阮季） 我从记事起，就住在北京西城区南长街甜水井胡同一号。这是父母苦心为我们经营的一个快乐的小天地。至今，这个小院还是我记忆中一个美好的梦。但是，这个小小的天地很快也被政治风暴摧残得七零八落。

1950年代末，父母凑钱在甜水井胡同购买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甜水井胡同的西头紧贴中南海的东墙根，东头就是我家，胡同里一共只有四个院门。我家前后两个跨院。进口是一个当时北京常见的门楼，门前的对联是：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当然都是繁体字。门两侧还有两个小小的石墩，好像是两只小小的狮子。一进门楼，是一个小院，向西一拐，便是主院。

我们全家人都住在主院里，北房三间为父母的卧室和父亲的书房兼客厅，西厢房两间为卫生间和厨房，南房三间为餐厅、孩子们与保姆的住房，还有卫生间，一间东厢房暂时无人居住，用作储藏室。

除了甜水井一号，母亲还有一处书房，共两个房间，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人民大学宿舍内，在红三楼丙组八号。楼下住的是著名党史研究专家胡华。我们都叫他胡华叔叔。他的儿子胡刚是我的小学同学。胡华叔叔可能神经衰弱，那时候母亲晚上在桌子上打字，胡华叔叔都会叫人上楼来阻止，说影响了他的休息。后来，人大的党委书记郭影秋在红三楼丙组四号住了一段时间，他搬走后，我家就住进了四号。直到今天，弟弟全家还住在那里。

尽管母亲从小读书，但也颇会治家。甜水井胡同小小的院子虽然不大，母亲却把它经营得有声有色，乐趣无穷。父亲喜欢种花。在他的书房前，东边是一株毛桃树，西边是一株葡萄和一株丁香。在东厢房的前面，爸爸和妈妈每年种上一些丝瓜、刀豆和苋菜。有一年，丝瓜到了该结的时候，却看不见挂果。妈妈站在一张凳子上仔细看着已经爬到房檐下（父母和我们在甜水井胡同）的丝瓜藤，发现在丝瓜叶的掩盖下有一个丝瓜已经长到小臂



般粗大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孙健曾提到当年到甜水井胡同我家做客的情形，连连称赞我家的饭菜好吃，金华火腿炖的冬瓜汤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夫人刘老师还说，从我家回来之后，孙老师大大赞扬我母亲善于持家。

可以说，甜水井胡同一号的生活是衣食无忧的。但有一段例外，这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母亲。因为妹妹京子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母亲正在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本来就营养不够，还要省出自己的口粮给父亲和孩子们吃，结果，母亲浮肿得很厉害。

其实，在甜水井胡同生活的这几年时间，父亲已经危机四伏。他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全国的点名批判，不能发表学术著作，在人民大学也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即使这样的环境中，母亲还能以平常心度之，在惊涛骇浪之中，为父亲和孩子们营造出一个平静的港湾，

也真够难为她了。这几年，是父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后来，父亲对我说：“你不知道甜水井胡同的几年有多么重要，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和休息。”

甜水井胡同的孩子，都到南长街小学上学，但当时铁一号附近的府学胡同小学是东城区第一中心小学，非常好。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安排我上了府学胡同小学。我在府学胡同小学时，不能每天回到家里，母亲就和我一起住在铁一号的那两间书房里，每周的中间和周末才回到甜水井胡同。

这是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最密切的岁月。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记得当时米票比较紧张，我和母亲开始没有买米证，吃饭的时候，只能买窝头和馒头。后来，母亲要出去参加“四清”运动了，为了安排我的午饭，就花了十斤米票，办了一个米证，又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猪油，让我吃米饭的时候，就用猪油和酱油拌饭吃，说这样很好吃。但是，我第一天就把米证丢了。所以最终也没有吃上猪油拌饭。

1968，踏上不归路

父亲和母亲工作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父亲从建校起就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父亲主持的历史教研室，1950年代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大多后来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各地很多大学历史系的中坚。

但是，父亲当时并不见容于人大，这有当时大的政治气候所致，也有人大的政治小环境的原因。父母在甜水井胡同一号购房居住的行为，在人大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房子是以母亲的名义购买的，但在人大，父亲还是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理由是共产党员不该拥有私房。为此，父母被迫把已经购置的、并经过翻盖和装修的甜水井胡同一号卖掉。

尽管如此，人大的很多人还是不依不饶，说是共产党员更不该卖房子。父母被迫把所已经出售的房子又收回来，再以“献产”的名义，交给北京市政府，由人大的职工居住。

我们在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宅，就这样被剥夺了。父母收回已经出售的住房，在退款给购房者时，把这笔房款加上数月的利息一并退还。这位购房者为此十分感动，觉得父母这样厚道的人真是少见。

父亲去世以后，历史学家李新曾经对我讲起当时的情况。他当时是人大党常委。父亲购置私有住房一事，曾经在党委会上讨论，很多人主张因此开除父亲的党籍。李新和另外一位常委坚持说，开除这样一位老同志的党籍务必慎重。



常委会后，李新找到父亲，告诉他必须赶紧把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房按照要求“献产”。父亲只得被迫把房产“献”出，这样，虽然党籍保住了，但父亲还是受到了党内的纪律处分。在文革中，甜水井胡同一号住宅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最终成为母亲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父亲写信给中组部，希望重新调查有关自己的错案，同时也提出了对私房落实政策的问题。此后，中组部复信，请人大为父亲落实政策，包

（母亲和儿女在铁一号钟楼前）括私房。父亲去世时，还留下遗嘱，希望人大把非法剥夺我家的私房还给子女。此后，虽然几届校长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是，阻力依然重重。直到现在，这一处私房也没有归还。

甜水井胡同一号被剥夺，我们全家搬到了铁一号，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当时仍在府学胡同小学上学，后来升入北京五中。在五中时，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老师，叫肖钰。他特别擅长教数学。一天，全校同学外出参加活动，回校时，肖钰老师在班会上说，今天的学校发生了重大的敌情，有人书写了“反动标语”。接着，他就带领大家呼喊革命口号。

不幸的是，出于口误，他呼喊革命口号时，误喊成“反动标语”的内容了。当时，他吓得脸煞白，赶紧带领大家又呼喊了多遍革命口号。当时的学生都只有十三四岁，看到老师紧张，觉得很好笑，都说要是追查下来，我们可以为老师作证，确系口误。过了一会，肖钰老师还是很不安，自己离开，自动跑去汇报了。

一会儿，我们就听到校园的大喇叭高声广播，全校紧急集合，到大操场开会。到大操场不久，就听到宣布，扭送现行反革命分子肖钰去公安局。听到这个消息，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怎么也想不通，怎么老师一下子变成现行反革命了？不过，到底是年龄尚小，是非不清，很快，我们就觉悟了：觉得自己可能是阶级斗争的警觉性不高，所以有人呼喊“反动口号”，还是非不辩，以为是口误、居然要给人家作证。

回家以后，我告诉妈妈这件事。妈妈似乎对我的觉悟不以为然，说：如果他真的是口误呢？这样把人家当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是毁了一个好老师吗？妈妈的态度和其他人真不一样。这件事情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母亲去世时，我正在内蒙古插队，家中的情况不甚了解，母亲自缢的详情，还是家里人告诉我的。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随后殃及全国各地的“清理（父亲与母亲）阶级队伍”运动爆发。据统计，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50多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

这年的12月，人民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是如火如荼，父亲当然在劫难逃，又被关押受审，在批斗父亲时，母亲还曾被陪斗过。那年，姐姐晓航17岁、弟弟小卫13岁、妹妹京子7岁。晓航已定于12月初去山西农村插队。

母亲的性格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能觉得在运动中受到了人身侮辱，全家可能都要被扫地出门，没有前途，所以绝望了，才毅然做出最后的抉择——在铁一号的家中自缢。



事后晓航回想，在妈妈自戕前一周，有一天家里到处都是敌敌畏的味道，尤其一个紫花碗，特别浓烈。可能那天妈妈就已经尝试过服敌敌畏自戕，但是没有最后下决心。

妈妈自戕之前的一个晚上，和晓航谈到很晚，大意是告诉她将来家里可能就要发生大的变动，没有办法再支持孩子们了。孩子们将来要依靠自己，好好的改造思想，也可以去找西安的大姨等等。晓航那时也不太理解，觉得很晒了，想去睡觉。但是妈妈不停地说。一直说到深夜一点多钟，晓航实在支持不住，就睡了。妈妈左思右想，可能犹豫了一夜，才最后决然走上了不归路。

早晨，也就是12月15日，孩子们在浴室中发现了妈妈，赶快去找平时认识的人大历史系的大人。当时，没有人马上来抢救妈妈，直到最后，工宣队、军宣队的人终于来了，还来了很多其他的人。家中人来人往，有人竟然趁乱偷走了我父亲刚刚发的两百多元的工资。

母亲离世以后，工宣队、军宣队也不让爸爸回家。在家的三个孩子很害怕，每天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过了十多天以后，爸爸才被释放，回到家里。

母亲去世之后两个多星期，在内蒙古插队的地方，我接到了母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信时，母亲大概还没有自戕的想法。信中写到，想给我寄一些学习资料。其中用了一句成语：欲速则不达。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回到北京，见到了姐姐晓航，她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形。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都有一个情景，反复地在我的梦境中出现：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好在家，母亲的行为被我们发现了，因此，母亲的生命得以挽救，我们没有失去母亲，我幸福得笑出声来。

不过，每次从这样的梦境醒来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地回到了真实的世界，重新发现了无可挽回的真相。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在梦中梦到母亲去世了，又梦到梦醒了，母亲去世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幸亏梦醒了……

当我真的从梦中醒来之后，怔忡了好久，不知道哪一个梦是真的，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离世了。后来，我读到庄生梦蝶的故事，想到自己的梦，马上就理解了。

母亲只活到48岁。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永远是年轻漂亮的。我没有“白发苍苍”的母亲的概念。不过，直到现在，我看到别人能够奉养父母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都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如果我也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就好了。我的大舅，享年89岁，



二舅享年98岁。他们和我的母亲是同胞兄妹。如果不是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我的母亲很可能也长寿如斯。

现在，我住在新西兰基督城，坐在阳光灿烂的客厅中，看着蓝天、白云和花园中盛开的杜鹃花，心里不禁幻想，如果父亲和母亲仍然健在，他们如果和我在一起，享受这份温馨和宁静，我们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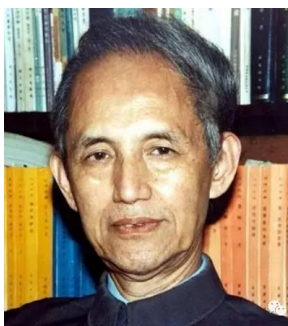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尚晓媛）活该多么美满！■

作者简介：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

【怀人】

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

孟小灯



父亲走了，也就不记得父亲节了，今天被约稿，内容还是写父亲。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多厚也写不完。父亲的称谓，是对儿女而言的，女儿我今天就写写父亲与我有关的点点滴滴。

先说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孟小灯。灯是什么，不落的太阳，（我的父亲孟氧）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灯却永远闪亮。但是父亲当年可没那狂妄的意思，

他眼里，灯仅仅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灵感来自蜡烛。他年轻时，夜里两点之前没睡过觉，陪着他著书立说的，只有桌上那盏绿玻璃灯罩的台灯。小灯就是一片温暖的光，安静的、谦和的，没有太阳那样光芒四射。

话说到这足够了，应了这名字，我前半辈子光照亮别人了，一点都没温暖自己。要是把小灯誉为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就别活了。

长大后父亲问我改不改名，我说不啦，已经习惯了。父亲指点我写文章时，又给我取了个笔名：子羊。子羊？什么意思？让我联想起“俯首甘为孺子牛”，受不了啦！我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野马一般的性格，怎么就沦为子羊了呢？当时真想离他出走。后经父亲耐心地劝说，我也就同意做个平和谦逊的乖孩子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我以为我以后就叫我孟子羊了，父亲告诉我，他们家姓赵，孟氧也是他的笔名，解放前给进步报纸写文章，用过很多笔名，孟氧这个笔名用得最多，后来人们只记得这个笔名，全然忘记他原来叫什么了。姓赵？赵子羊？赵紫阳？当年赵紫阳还在台上，不能叫；后来赵紫阳下去了，更不能叫了。

那些年父亲整天伏案著文章，很辛苦，我想设法让他休息，经常坐写字台对面与他



搞笑，纠结的还是子羊。我说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叫子羊，父亲抬起头疑问，我说，你是想让我像你一样，又怕我不能完全像，就叫我子羊。父亲眼神鼓励我继续，我接着说，你看，孟字下去掉皿，氧字上去掉气，不就成了“撒头撒尾”的孟氧了

（父亲和我）吗？父亲笑了，嗔怪说我想多了。

其实，父亲一直叫我灯孩子，这个乳名只有父亲这样叫，连母亲都从来没有叫过一次。我知道有叫孟小冬的，孟小灯有没有重名不知道，但是灯孩子，只属于父亲的我。

我曾偶然看到一张老照片：那时我刚满月，母亲抱着我出来晒太阳，正巧赶上父亲和同事走进院子，父亲走近我们母女，手背在后面看我，同事带着相机，给我们照了我的第一张全家福。

后来我翻过照片看见后面父亲的手迹：我绝非袖手旁观。大概没像大多数父亲那样接过我或和我们并排留影而解释的，明明就是“袖手旁观”嘛！

我1956年出生，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坏处不说了，好处是有很多时间待在家里。从反右到文革，我就没好好上过几年学。小时候父亲只关心我身体健康，不说谎话，从不管我学习，期末考试没有双百也不批评，因为他第一次拿起我语文书让我背课文时，我从第一课一直背到最后一课，中途几次打断我都置之不理，等全书背完我大喘气时，他点着我的脑门说：太爱表现了。

也不记得小时候他对我有什么教诲了，只记得他没大没小地气我。假期我三天就把所有作业赶完了，他却规定要我每天练大字。同学来找我出去玩，等在门外，他说写够三篇就去，急得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写，他站旁边用砚台接着，说正好可以研墨了。

他看出我的学习能力并赞叹我的记忆力，知道我除了贪玩没别的毛病，所以他从此不再过问功课的事了，甚至说：小学时交给小学老师来管，长大了再交给我。天有不测风云呀！哪有机会交给他，没等长大，就文革了，他被关进监狱，母亲进了牛棚，我就成了有父有母的孤儿了。

我虽没有学历，却多少还有点文化，毕竟是从小坐在爸爸腿上，闻着书香长大。后来我看了电影讲电影，看了小说讲小说，身边总是不缺朋友。人在脱离了父母之后，成长的速度惊人，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经济学的语言，我认为社会和环境才是塑造人的根本。我到今天，既不是书生，又不是淑女，那个年代脱不了干系！当然父亲也脱不了干系。

父亲被抓走那年我还不满12岁，不仅每日惊恐万状，甚至食不果腹。在父亲杳无音信几年后，被判刑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还是坏处不说，好处是可以和家人通信了，我没有被重刑吓倒，我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是想搞武装暴动、颠覆共产党的反革命。我紧紧抓住了迟来的机会，从此开始了和狱中父亲的来去都被拆开检查的通信。

没人告诉我狱中通信规定，我像天生就知道一样，每封信都安全通过检查，我们谈的内容之广泛就像自由人。就在那几年，父亲给我讲了许多知识，除了不讲政治，其他无所不聊。他知道我毕业后在外地船厂工作，就告诉我潮汐与月亮的关系，教我怎样计算每天涨潮落潮的准确时间；还教我各种文体和诗歌的写作，偶尔也讲历史及人物分析。

一次，我写信兴致勃勃地说我去泰山旅游，当登顶时我感慨：我比泰山高！遭到父亲点评：你有多高？10年没见你，料你不过1.65米，怎么能比泰山？你应该说一览众山小。哦！什么父亲，如此不解幽默，代沟啊！



（父亲和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鼓起勇气写信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敢说，现在忍不住告诉你，我想你，想去看望你！父亲回信很快，他说如果我不主动来看他，他一辈子也不会要求我这么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儿，来到阴森的监狱，看望一个被判死刑并带给我无限苦难的父亲。终于还是我先开口了，他赶紧告诉我怎样来探监，还要在单位保卫科开具介绍信，证明我是他的女儿。我照办了，并把母亲给我准备的路费买成食品，用5分钱买了张站台票，混上了开往山西临汾的列车。

查票，我没有，两次被轰下车，而我这个闯荡江湖的人就不怕这个，换乘短途车，倒腾两次也就到了。下车后实在难以启齿打听临汾第三监狱，索性雇了个三轮车，车夫知道监狱不远，几分钟就能走到，但欺负我是女性外乡人、又是去那种地方，竟拉着车大街小巷地绕，把我绕晕了，才拉到监狱门口，还索取了5元钱。

进了监狱，我在会见室等候。环顾这间屋子，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隔着玻璃看，拿着听筒说，而是前后两个门，家属走前门，犯人走后门，一条贯穿两边的高高柜台把屋子分开。我心狂跳，等待那一刻，父亲身穿编号狱服出现在门口，我真的认不出了，我努力辨认，更看不清了，泪水挡住了视线……

父亲安慰我之后又询问了家常，接着他换了话题，语气中充满力量：抓紧时间，爸爸

简单和你说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我绝对不是反革命，更没有搞过什么武装暴动。第二，我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即便在学术上我也没有搞错。第三，我没有罪，也从来没有认过罪，我在不断地上诉，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党中央。灯孩子，你放心，做我的女儿绝不丢人！

无需多言，听了这样的话，我已经不再流泪了，临别时，父亲握住我的手，一团纸自然而然到了我的手里。我们没有约定，但关键时刻我像地下工作者那样，四下一看，没人注意，匆匆告辞，然后大大方方出了监狱。

我进了一处公共女厕，打开父亲塞给我的纸团，正面反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申诉文字。我草草看了一遍，又叠好塞进胸衣，这才如释重负、信心满满地出来。我走了，父亲彻夜不眠，夜里12点零5分的火车，父亲真怕再出什么不测。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我爸不是坏人！真的不是！不是我自己意念的不是，是真的不是！这次见面意义天大，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让冤案彻底平反！从此我走上了漫漫申诉路。

刚探监回来的那些日子，整天就像开了锅的水。我把从监狱拿回的纸条工整誊写，然后自己刻成蜡版，又借来油墨辊印机，自己在家干得热火朝天。一份份装订后还温热的散发着油墨芳香的申诉材料，经过我的手我的腿，投遍了我认为有一丝希望的信箱。

一个孩子，无论想法多美好，无论决心有多大，无论如何也无力抗衡社会。法院的通知就像晴天霹雳，案犯和家属的申诉被驳回，维持原判。胡耀邦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解放几十万右派，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春天盼解放，盼来的父亲复审的结果却如此让人失望。我累了，气馁了，情绪一度接近谷底。

父亲也得到了同样的复审通知，同时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他平静地写来一封信，是这样说的：灯孩子，你现在干的事情，就像走一百里路，你已经走了九十九里，就剩最后的一里了。而这一里相当前面九十九里，一样难走，希望你咬咬牙，再坚持一下。

就这一段话，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又精神抖擞再次上访。我要将这官司打到底！父亲出狱后我们说起这事，他说当时写这段话是何等艰难，就是自己死在狱里，即便女儿躺倒

不干了，他也不能对我要求什么。他给女儿带来的苦难已经太多了，可是现在形势这么好，平反的机会很大，不坚持太可惜了，思虑权衡了许久。

替父申冤最有效的一次，是我在北京市高法门口蹲守三天。因为我发现通过普通上访接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斗胆直接找高法院长。天天像来上班一样准时，死盯着出出进进每一个人，不时也和看门大爷聊两句，第三天看门大爷就被我感动了，主动帮我联系了院长。

院长听我一席炒蹦豆般不加标点符号、不敢停顿分秒的诉说，点点头，要看我的申诉书，当院长看到我申诉书最后一句坚定地写着：“这一冤案如果得不到彻底平反，我将申诉不止”时，拿起了钢笔，郑重地在申诉书空白处写下决定父亲命运的几个字：“请转刑庭，找专人复审。薛光华”。当时情景不用赘述，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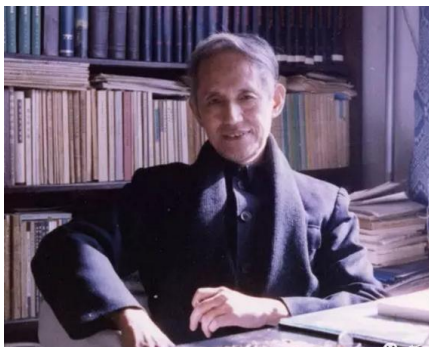
案子很快就有了进展，经过专门为父亲成立的七人组成的合议庭，阅卷、审理、核查，我又建议他们与被告见面，不要总是看那些不属实的材料，他们接受了。在监狱，又一次开庭，终于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了，回去研究后决定无罪释放。过程一波三折，限于本文篇幅，一笔带过了。

写到这，我不想写了，那些事早就翻篇了。我曾经冒失地问过父亲一次：当年文革群众组织逼供信，屈打成招，他们打过你么？我知道我有胆量问也没胆量听，父亲表情沉重，回答我了：当然，小打咬咬牙就忍过去了，大打就晕过去了。我难受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揭开这块伤疤。时间过滤了许多忧伤，我会选择性失忆，都快想不起那些不愉快的场面了，留在心里的只是对美好的思念。

父亲出狱时唯一的行李是一个破纸箱，里面装满父亲在狱中写的与自己案情无关的学术手稿。狱友打击他说，明天就上断头台了，写什么也没有用了。父亲回答，明天即使上断头台，今天不写还能干什么？父亲在狱中除了写学术论文还自学了数理化，他竟然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并不难懂，只要把公式用文字表达。

父亲回来后，没有计较个人恩怨。他说那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个人不过是历史长河中

的一滴水，推动历史车轮的人也往往被碾进轮下，在监狱已经耽误了十三年，要抓紧时间，有太多事要干。



这平反真够彻底的，再也没有麻烦找上头了，好事却接连不断。第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教授，最佳讲课教师、优秀共产党员等等，高帽子戴了一头。频频被迫参加社会活动，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悄悄对我说，我是不会被捧晕的，电视台的摄像机都架在家里了，还是被他婉拒了。

（父亲与他的书房）多年的研究，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他学了自然科学，更是如虎添翼。我说你到底写什么呢？能不能用一句我能听懂的话说明白？他想了一下：我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父亲几乎争分夺秒地工作，我却不学无术，享受着在父亲身边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希望我考大学，辅导我政治经济学，张口就讲《资本论》，还讲第二卷的地租理论，当我是研究生哪！我和父亲渐行渐远，我心里很别扭。

那一年，屋漏偏逢连夜雨，诸事不顺。有一天，我在单位门口等车，同事过来与我调侃，他说你怎么还在这，改革大潮都来了怎么还不下海？我何德何能，下去还不淹死？你怕谁呀？上面你敢和江泽民说话，下面你敢和大流氓拼杀……我晕了，为了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我辞了工作，扑通一声跳下海了。好景不长，我就呛了两口水，狼狈爬上岸。

我病了，接着公司又把我开了，沮丧之极。我躺在床上，父亲很冷静地对我说了三句话：关于病，现在科学和医学如此发达，相信你的病很快就会治好；关于工作，你失业了，还有爸爸呢，我能保证你生活水平不下降；关于你，你是谁呀，堂堂孟小灯，什么困难能压倒你？听后我起身看病去了。病好后赋闲在家，百无聊赖，心情极差。

父亲说，你要是有点特长，外语、数学都行，我也能帮到你。听了这话我心里特来气，我为什么什么都不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其实女儿对父亲什么撒娇话都可说，效果也不

会差，可是我一句毒舌话顺着嘴边就溜出来了：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你为了我，一句话都不肯说……父亲沉默了，披上大衣转身出去了。

父亲去了校长办公室，对校长说：我的女儿……刚一张口眼圈就红了，校长连忙制止说：孟老师，你别着急，是我们没考虑周到，给你落实政策是我们应该做的，包括你的家属、子女，你之前受了那么多冤屈，回来又为学校做了那么多贡献，我们一定把你的问题解决好。接下来，学校人事调动史上最快的一次就是为我的，三天之后我就进学校上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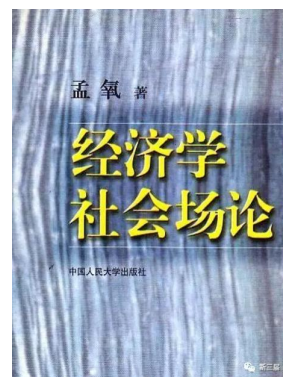
听见母亲低声说：你把她调到身边，不出三个月她就给你惹麻烦了，父亲轻松地回：不用三个月，只要一个月不惹麻烦，她就保住了。我进学校后，见每个老师不用讲义都能干侃三节课，我就闭嘴了，领导说我性格内向；大学的工作程序我不熟悉，干得慢，领导说我们教育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细心负责的人。哦！这是走了什么运呀！不过我进了学校，摇身一变，的确成了“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校长见了我父亲都忍不住夸我两句。

我是顺风顺水留在学校了，说那句不符合我做人风格的话，却始终在心里挥之不去，我不能原谅自己。父亲是一个多么自尊自律的人，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或家人的事麻烦别人；我为父亲做的事是一个女儿该做的，再正常不过了，怎么能成了要挟父亲的杀手锏呢？懊悔至今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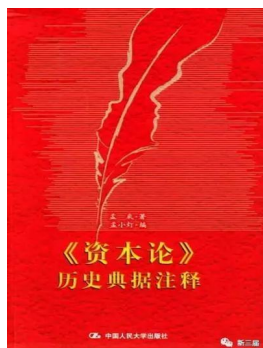
父亲一生历经种种迫害，加之出狱后忘我工作，身体垮了，74岁就带着无限的遗憾离世了。最后他说，到了收获的季节，生命却离我而去。他在病床上写完《经济学社会场论》序言最后一句，再也不谈理论了，我竭尽全力地照看他，搭上半条命也没能挽留住他。

父亲走了，我病倒了，父亲病了还有我，我病了却没有父亲了。手术后昏迷了三天三夜，冥冥中看见父亲身穿蓝条病号服渐渐走远的背影，一下惊醒了，我明白，我和父亲阴阳两隔永不相见了。那一刻我坚强了，我知道没有父亲的日子全靠我了，我要努力！

生命不知何时也会离我而去，我不能再浑浑噩噩混世了，我想了许多，想起父亲曾经问过我，愿不愿意给他写传记，我当时头摇得像拨浪鼓。待我恢复了元气，首先就要给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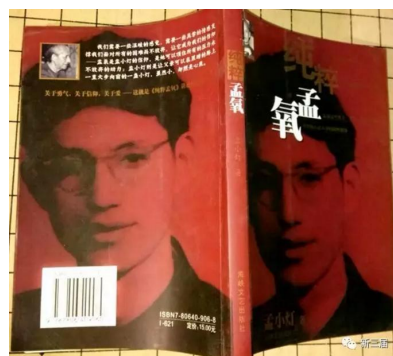


亲写传记。我没写过书，也不知道怎样写，我就把我能想到的记录下来，我的《纯粹孟氧》一书就顺利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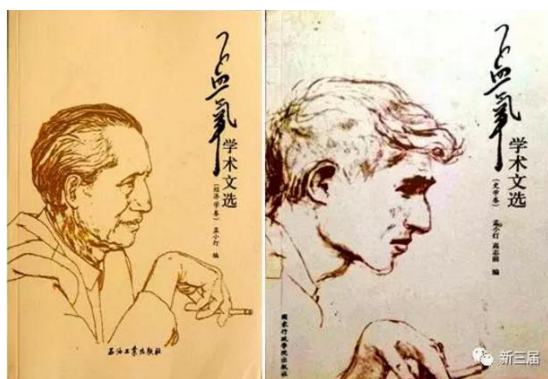


父亲去世快两年了，他的《经济学社会场论》还没出，我多次催促出版社也没用。最终还是想出了办法，和校长商量后我去出版社，对他们说要开孟氧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全国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学者，希望赶在孟老师两周年忌日前把书印好。书出了，会也如期开了，很成功。

父亲是中国注释《资本论》的第一人，他从1953年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开始是在校刊上陆续发表，1957年被划成右派后被退稿了，1980年出狱后又有刊物约稿，他继续写。刊物中途因经费问题停刊了，注释又搁置下来，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出版自己的单行本。这本书的命运和它的作者一样坎坷，但是即便他被打成右派或关在狱中，油印的、正式出版的、（孟小灯为父亲写的书）



不写他名字的注释，还是在各大学经济系流传。



父亲的老友鼓励我把这本书整理出版，我做了，出版了，又为父亲完成了一件心愿。在校史馆展出的父亲写的各个时期、各个版本的注释，包括最后我出版的、我设计封面的、漂亮的人大红的、砖头那么厚的《〈资本论〉历史典故注释》，被定义为帮助了一代人学习《资本论》。

后来我又陆续整理出版了《孟氧学术文选（史学卷）》、《孟氧学术文选（经济学篇）》，其中史学卷最难做，幸好有朋友帮忙，其艰辛在此不提了。此时，不光是父亲的心愿，连同我的心愿也了了。

在整理、校对、出版的过程中，我是快乐的，好像又和父亲走过一段时光，今年恰逢



父亲去世 20 周年，往事还是历历在目。在我看来父亲还是幸运的，首先，不是说他的经历还不够坎坷，也不是说他的遭遇还不算悲壮，因为有多少人虽然最终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自己却早早含冤九泉，而父亲看见了自己的胜利，看见了敌人被钉在耻辱柱上。其次，父亲是幸运的，因为他有我，有一盏小灯，小灯光亮微弱，却温暖父亲的心。20 年来，父亲的目光一天也没离开过我，同样指引我做人做事。■

作者简介：1956 年出生，曾任人民大学经济系教务秘书。

【怀人】

祖母，你因何受难

陈 原

先祖母，目不识丁，一生含辛茹苦，从事过的唯一职业就是帮佣，却在半个世纪前被难，成为那个时代最早的受难者之一。

五十年来，一想起那一幕幕场景，悲哀、悔恨、激愤，我就难以自己，似乎已经成了永久的心灵创伤，灼痛不已。

铁一号钟楼前受辱

1966 年，我家住在北京张自忠路三号，这里过去是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习惯称铁一号。铁一号是人民大学的宿舍。九月的一天，我偶然在我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发自上海嘉定的电报，报封上的收报人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我当时九岁，看到这封来自我祖籍的电报，很自然就联想到我的祖母。赶紧抽出电报一看，泪水顿时夺眶而出。电报

写道：“你校档案系陈兆祺之母张云英于9月8日投河自杀希通知陈来处理事后为要嘉定娄塘派出所。”电报带有加急字样。别看我年纪不大，但祖母自杀的原因似乎已经无需大人解释了）。那年的八月，史称“红八月”。

一天我去祖母住的地方给她送东西，在红一楼甲组五号，迎面就看到一张半扇门大小的“勒令”白纸黑字写着：限令地主分子张云英立即返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署名东城区红卫兵。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邻居告诉我，“你奶奶正在钟楼下面呢”。钟楼

是铁一号大门内正中的一座建筑，算是这座院落里的主建筑，钟楼底层的大教室进入文革后就成了批判会的场所，大教室外的空地处于路口，人来人往，则成了批斗会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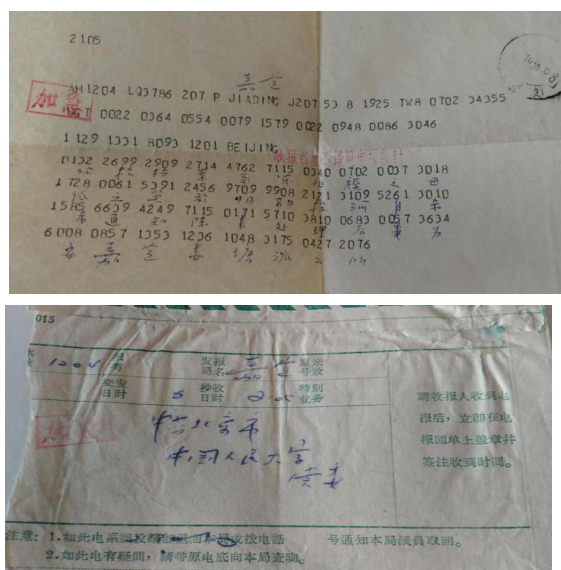
我赶到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正围着中间的空地，二十多位平时住在大院里的爷爷奶奶们蹲在地上，低着头，脖子挂着一块块牌子，上书地主分子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资本家某某某、国民党反动军官太太某某、大地主小老婆某某

（上海嘉定娄塘派出所1966年9月发来的电报）某。我的祖母蜷缩其中。遣返原籍前，红卫兵强迫他们每天到这里接受批斗。

我没敢细看，转身跑回家中，一路还听到院里的小伙伴喊我是地主婆的孙子。

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在西郊人大参加文革，很晚回家，有时根本不回家，晚上和我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叮嘱要我好好上学，不要管我奶奶的事情。可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钟楼前，都会看到人们围着祖母他们辱骂、吐口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很困惑。

我们兄弟三人一直都由祖母照顾，她辛苦勤奋，不但为我们洗衣做饭，还抽空打扫楼道，将楼道的扶手从上抹到下，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她怎么会忽然成了众人憎恨的地主婆？



和她一起挨批斗的那些爷爷奶奶怎么也转眼间就成了阶级敌人？

大概过了一周，一天中午下学回来，在红一楼旁的路上，正巧撞上我父亲和我表兄，一边一个，中间是我祖母，往大门口匆匆赶去。我祖母一眼看到我，就高声呼唤我的小名。我正想迎上去，不想我父亲拼命摆手，让我绕过去。祖母过去后，还不停地回头喊我，我也边走边回头，但始终没喊出一句来。没料到，这一回头，竟是我与祖母的永别！

家乡水塘惨遭不幸

回老家的一路，她是怎样的情景，我无从得知，但可以想像出来。

那时北京火车站有部滚动电梯，大概算是大众可去的公共场合里唯一的一部电梯。我们这些少儿在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可玩耍的，所以常常跑去乘坐，当作乐趣。在北京火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像我祖母那样的人，被剃成阴阳头，身上还打上各种标记，有人往他们身上扔石头，有人吐痰。我亲眼目睹一位老人，头上血流如注，自己捂着伤口往车站里面跑去。

过后很多年，我听上海的亲戚说，我的祖母在列车上被红卫兵发现是遣返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就当场给她剃了阴阳头。祖母用头巾包着头，先到上海，看望了几家亲戚，发现家家都已自身难保，只得回到嘉定娄塘镇。

1986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我的祖籍嘉定娄塘，不想，轰动了镇上，说是：陈家里的孙子回来了！还有人说我是“陈家姨娘的孙子”，而祖母实际是“续弦”，并非侧室偏房。我伫立在祖母自尽的那一洼水塘旁，男男女女都围在我的身边，向我诉说他们所知道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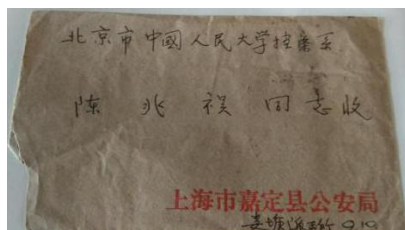
一位老奶奶抓住我的胳膊说，她也是当年被赶回来的，但她熬过来了，“如果你奶奶像我那样，忍一忍，大概就可以活过来的。”

“她死的时候，一条头巾包着整个头。我们都看到了。”几位中年人细致地形容。

住在水塘旁的一户人家告诉我，祖母的遗体漂浮在水塘靠近他们家的那一侧，派出所

打捞遗体后只得从他们家门里抬出，为此还锯掉了门框。

经人引领，我来到祖母弃世前栖身的小屋，这是一户人家的柴房，不足六平米，阴暗潮湿，



连一扇窗户都没有。镇上的人说，祖母被镇上安排住在这里

时，只有杂物，没有床，也

没有桌椅。眼见如此简陋破

败的地方，我不知道那短短

的几天，她是如何生活的。

此情此景，已经令我心酸不已，可更为悲怆的内幕还在后面。

当晚，我住在嘉定城里。好友的姐姐在检察院工作，她的邻居是法院法官，他们说，小的时候常常跟随大人去我祖父家，认识我的祖父母。文革后，清理文革遗案，检察院和法院都怀疑我的祖母是他杀。理由是，距离她最近的是一条河流，如果投河，为什么不选择这里，而跑到距离较远的大东街水塘，浅浅的水塘很难淹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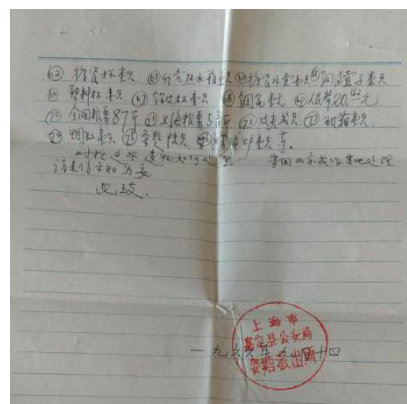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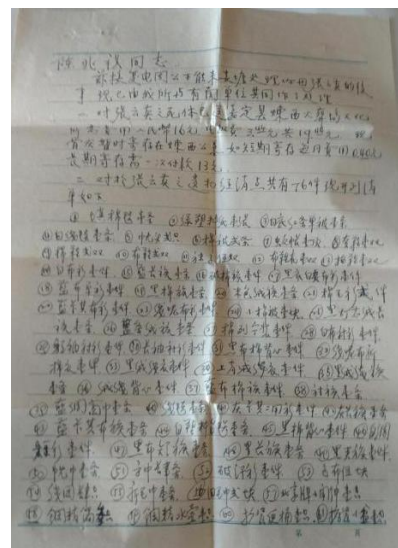
我的祖母带回的日用品很多，共有76种，上百件，完全是打算长期过日子的模样，为什么会忽然自尽？最关键

的是，她留下的全国粮票很多，钱却极少，而据（上海嘉定娄塘派出所1966年9月来信）

我的父亲和亲戚们说，为了她回乡度日，每家都给了不少钱。这些钱估计是被人拿走了，之所以不拿全国粮票，那是因为容易被察觉。县里怀疑谋害我祖母的人是大东街的造反派，是谋财害命。

当我将这些疑问带回娄塘镇时，镇上的人却说不会的，他们对我祖母都很好，很照顾的，没人会谋害她。

以后，每次去上海，我都会来到娄塘的这片池塘旁默默思念我的祖母。镇上见过她的



人尽管越来越少，但年轻一代又都会告诉我，他们听父母、祖父母讲过，知道有一位老太太曾经在这里自杀。再往后，池塘填平了，新房纷纷建起，但一个遥远的回忆依然不散：一位老人很多年前在这里结束了生命。说是老人，其实，祖母遇难那年才59岁。

与大时代结为因果

我的祖母究竟是投塘自尽还是被杀后投进池塘？这是一个永远的谜。无数个日日夜



夜，我因祖母的遇难而自责、而悔恨。临别时，我竟然没有再喊她一声奶奶；当我知道她的不幸后，竟然没有致信嘉定，要求彻查她的死因。

终于，有一天，我在梦中又遇到了我的祖母。她的形象定格在铁一号钟楼前的那一幕，散乱的头发、苍白的面容、身上落满痰迹。我猛然惊醒，两天后就赶到上海，托好友为我的祖母在嘉定选择了一块墓地。当墓地落成时，我面对墓碑，心中长久地默念慈爱的奶奶。

（上海嘉定，祖母的墓地）说这是墓地，可连衣冠冢都不是，墓碑上下，空空荡荡，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片遗物，只存有我们这些子孙的哀思之情。

雕塑家吴为山曾为我的祖母塑了一尊头像，因为无从看到我的祖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只能从对我的了解来想像我的祖母。结果，塑像看上去好像一位知识女性。事实上，我的祖母从未读过书，右眼自幼患疾，几近失明。

根据现在找到的族谱看，我的祖先陈万山曾经居住在浙江余杭，满清入关，“嘉定三屠”，以致嘉定田园荒芜，于是他率全家徙居江苏嘉定娄塘，晴耕雨读，开创家业。先祖陈虞璇确实是位乡绅，或者叫地主，不但家有良田，还在上海几家大企业做过会计师，旧时称账房先生，家里的书房摆满了中外书籍，而我的伯父曾是上海有名的律师。

祖母姓张，原本住在娄塘临近的镇上，家境贫寒，祖母的母亲就是我祖父家的佣人，因此常常带着我的祖母过来一起为我祖父家做事。我的祖父花甲之年断弦，就娶了我的祖母，生下了我的父亲。

祖母自入陈门，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祖父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家道中落，祖母独撑门户，母兼父职，只能靠变卖田产过日子。日军侵华，江浙沦陷，祖母背着包袱，搀扶着我的祖父，拉着我的父亲，加入了逃难的人群，辗转于江南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上海成为孤岛之际，祖母怀揣大米，夜间爬过封锁线，靠枪口下贩运粮食养家糊口。由于家族财产纠纷，祖母还曾被告上法庭，关入大牢。

1947年3月，祖父病故，此时家里已经田无一垄，房无一间，祖母和父亲二人寄人篱下。祖母不得已，外出帮佣，直至1950年代初才进京与我父亲生活在一起。大约六七年前，我曾托人查阅上海嘉定的土改档案，其中我家多位亲戚的名字均有记载，而祖母，既无田地记录，也无房屋在案，可偏偏因为我的祖父曾经是地主，结果划了个地主成分。这个“剥削阶级”的帽子一戴就是终生。

土改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岂止是其中发生了什么，其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出身的认定，更成为一种烙印，长达30多年里，让一部分人几代在社会生活里抬不起头来，左右了他们的人生走向。一遇政治运动的风吹草动，他们往往最先遭劫。文革爆发，他们又是最早的受难者，一再被宰割、被侮辱、被伤害。惨绝人寰的北京大兴、湖南道县等地的屠杀无不以他们为目标，从刚出生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者，无一幸免。

我在农村插队时，全村有30多位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经常被大喇叭叫到大队部训话。苦活、累活，不记工分的活，都由他们承担；招工、当兵、外出上学，与他们完全绝缘。而他们大多成长在新社会，除了血缘硬被打上印记外，与旧时代毫无关系，却一生下来就成了“贱民”。有的人虽说被“摘帽”，可“摘帽”本身就是一种帽子，依然低人一等。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不再受歧视。

我的祖母，一介平民，生下来无非就是干活、结婚、生孩子，相夫教子，靠自己的双

手劳动一生，对政治一无所知，既不想招谁，也不去惹谁，只求过个平稳日子。可是，时代的惊涛骇浪却将她推入深渊谷底，命如蝼蚁，不要说反抗，就连活下去的机会都丧失殆尽，只能任人践踏，草草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愿祖母在另一个世界平安无事，但愿她的冤魂寄身那方墓地，不再游走哀伤。■

【述往】

我成了叛徒、特务

卫兴华

我是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走过来的，几乎每次“左”的政治运动我都是挨整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前，整个政治空气是比较“左”的，我自己又喜欢独立思考，跟不上“左”的那一套。我1947年入党，后来被捕。1955年“肃反”，自然是审查的对象。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差一点被划成“右派”，最后划了一个“中右”。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给学校个别领导提意见，说他缺乏科学态度、缺乏民主作风。我讲了些例子，主要是指校方组织批判我校历史学家尚钺教授关于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历史分期问题，我提出这是一个科学、民主的问题，要讲科学、讲民主。人家就说我是在提五四运动的口号，说你在向谁要科学要民主呢？这不是说党不民主，党不科学吗？这不是反党吗？因此，我被划成“中右”，被打入另册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特务”，被群众专政，受冲击也很大。那时凡是坐过牢的全是叛徒，我也不例外。他们的道理是：敌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怎么把你放出来的？肯定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我们地下工作者死了很多人，那还不是你们出卖了同志，靠出卖同志不就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吗？我说如果说我是“叛徒”，你们应该查一下我是怎么叛变的，查一下报上登过我什么嘛。他们说要害就在这里。如果报纸上登了你写的自白书、自首书，你就当不成特务了；把你放出来，报上不登什么，那

正好让你当“特务”。在这种逻辑下，我就成了“叛徒”和“特务”。

我被抓到地下室，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教学楼二楼的地下室，被严刑拷打，不仅拳打脚踢，还用木棍打。打够了、打累了，就把我押到一个小屋里，水泥地上铺点稻草。我当时的信念是：第一不能自杀，第二不能被杀。那时候经常抓你，放出来以后，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打一顿，逼着你交代。没有的事情，我怎么交代？生命没有保障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想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赶快跑掉了。因为档案里都有我老家的地址，我没敢回家，就跑到一个远方本家的哥哥那里，他在大同当煤矿工人。我在大同躲了二十多天。后来就回了老家，又躲了一个多月。听到电台广播军宣队、工宣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我觉得生命有保障了，就回校了。

回来以后，我、宋涛、吴大琨、项冲、徐禾、李光宇等十几个人都被关到“专政队”挨批挨斗。那时，我是“叛徒”，吴大琨是“反革命”，宋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都受到监管，失去了自由。我和宋涛是被关押时间最长的，1968年过春节也被关着。

直到1975年，我才恢复了教学工作。由于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经济学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1984年我当经济学系主任的时候，才彻底地把我的最后一些历史问题搞清楚。1984年10月18日的组织结论是“卫在敌人审讯时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和个人身份”，并肯定我由太原到北平后，“参加了组织了山西流平学生的反阎活动，包围前门外宪兵队，保存了地下工作人员所寄存的太原城防图，还介绍过进步学生去解放区。”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党籍恢复到1947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从1946年算起。

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很坏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坏事也变成了好事。为什么呢？“文革”中“左”的那一套，不仅仅是我们一般的下层人员受到迫害，包括像邓小平、彭真他们这些高层都受到迫害。他们就会知道，过去“左”的一套，害死了多少人啊，政策就慢慢地转过来，平反昭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政策、文件一个个地出来了，冤假错案慢慢地平反了。有

些历史问题，原来造反派搞调查是想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大搞“逼供信”，后来实事求是地调查之后没有这回事，反而对我有利了。他们把正面、反面人物都找了，最后才把我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了。■

作者简介：1925年出生，山西五台人，经济学家，195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本文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求是园名家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述往】

我在文革中是怎样闹革命的（下）

林俊德

也成了“一方面军”

11月9日下午，与刘嗣安、李吉荣、杨秉文、侯建华等同学离京前往湖南长沙。参加由我班上述同学，语文系朱维群、牛玉秋，新闻系邱一兵、张春富，计统系陈海泉、靳竹林，财贸系唐正学，英语专修班老师谌馨荪、李宗惠，学生高明光，北京医学院卫生系王诗明、胡冬初、张宏炎、何家春、许长安、徐永安、张玲、张灏东等人组成的“首都红卫长征军第一方面军”，拟沿当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路线步行串联，分头离开北京到长沙集中，尔后从长沙起程。

11日抵长沙，住湖南师范学院。至13日，各处人员基本到齐。此后几天，参观了毛主席早年读书的湖南第一师范、中共湖南区委旧址清水塘革命纪念馆，游览了岳麓山，还到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旧居，为步行串联作思想准备。

22日，共23人的队伍踏上征程。头一天走了50多里到黄花，夜住黄花“长征接待站”。第二天走了60多里，傍晚赶到浏阳县蕉溪公社高陞桥大队。据介绍，这个大队学习毛主席

著作比较好，公社在这里办了一所党校。该校没有固定校舍，招收的800多个学员分散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学员大多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每期10天左右，每天有半天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半天学习毛著、改造思想、解决实际问题。学习结束即回去工作。看来这样的党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同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最不会脱离实际、脱离劳动，最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出修正主义，是培养训练干部的好方法，是办党校的正确方向。当晚住在该大队“长征接待站”。

次日，即24日，清早参观该大队举办的阶级斗争展览会；中午与红卫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吃“忆苦餐”（野菜、薯叶掺少量大米煮的稀饭），还请了两位苦大仇深、吃了半辈子野菜的贫农老大娘来忆苦，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吃完“忆苦餐”，即前往八里开外的革命老根据地彭家湾（蕉溪公社樟树大队），受到毛主席的早年同学、新民学会会员、老共产党员彭道良烈士的儿子、复员军人彭早尔的热烈欢迎，并立即为我们介绍这个地方的悲壮革命斗争史：当年这个村有70多户人家，50多户参加过革命，20多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特别介绍了毛主席早期在这儿的活动情况。晚饭后，彭早尔请来3位当年的老红军给我们讲述革命斗争史，他们讲的话太难懂，效果不大好。会后，樟树大队组织文艺演出队慰问我们，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也唱了几首歌，搞了个联欢，把浓烈的革命气氛推向高潮。晚上分散到贫下中农家住，我与新闻系的张春富住在上屋生产队彭诗倩家，他们一家十分热情诚恳，只是讲的话不好懂，难以沟通，有些遗憾。

25日上午，彭早尔带我们参观几处革命遗迹：一处是毛主席1927年前后到过并召开会议的一间古老房子的厅堂，彭早尔特地请来当年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李子寿老人为我们作介绍；第二处是1927年前后破“四旧”的遗迹——当时反动派在这儿建庙宇，装神弄鬼威胁老百姓，革命群众奋起铲锄了它，反动派重新把它建起来，革命群众再次捣毁它，……几经建起，又几经破坏，现在留下几个石墩；第三处是两位革命烈士悬头的大树树墩——当年有两位革命英雄（一位叫彭子明、一位姓吴，都不是本地人）在这里英勇就义，敌人将他俩的头颅割下来挂在这棵大树上，革命群众去抢，没到手，后花八块大洋买来一颗头，

随即又被敌人夺去，……抢来夺去，最后抢到一颗，由烈士的亲人缝到遗体上。现在留下了那棵大树的树墩（在一条小溪旁）；第四处是当年我红军游击队作战的战场（现为一片田地），我军的一位叫苏文东的支队长在此负伤，肠子径往外流，他一手捂住肚子，一手挥动旗子指向前方，拼尽全力喊道：“同志们，冲啊！”时隔30多年，这个冲锋号令还在激励着这儿的革命人民奋勇向前。参观了这几处革命遗迹，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午饭后，我们的队伍重新踏上串连的征程，彭家湾的贫下中农和革命青年夹道欢送，彭早尔佩戴全部勋章、奖章，鸣放鞭炮为我们送行，青少们争着为我们背背包、拿行李，送出村外好几里地，直到蕉溪岭下，经我们再三劝阻，才返回。离开彭家湾后，我们越过上3里、下3里的蕉溪岭，行走35里，于晚间到达浏阳县城，当晚住浏阳县红卫兵长征接待站（原县人委招待所）。

26日，朝文家市方向前进。中午路过尺瑶公社枫林大队，打前站的同志安排我们在大队的一家饭店吃午饭，我们发现这家饭店是专为赚钱而开的（所谓“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就“造了它的反”，把负责人“教育了”一番，并打电话告知公社，请他们处理。店里的伙计规规矩矩地为我们做了一顿饭，让我们吃得饱饱、好好的。（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是多么荒唐，又是多么幼稚、可笑！）天黑时赶到文家市公社楼前大队，这一天走了70多里，是出征以来行程最长的一天。当晚住该大队“长征接待站”。27日中午到达文家市，在“长征接待站”安顿了下来。当晚参观当年秋收起义部队集中的里仁学校，听这里专管文物古蹟的李海亮介绍文家市的革命斗争史：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集中，毛主席也来到这里，住里仁学校，当晚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20日晨，毛主席在里仁学校操场向起义部队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9月21日，毛主席率起义部队由

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文家市是毛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在这里，我们参加了秋收起义部队纪念馆建筑工程的劳动；参观了1930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晨毛主席率部队攻打文家市、消灭敌军一个旅兵力的战场遗址棺材岭。进行了短暂的整训，总结出征以来的得失，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步骤；利用全队会议间隙，队里的5位党员（李宗惠、何家春、王诗明、张宏炎和我，李是正式党员）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在长征队中如何起模范带头作用问题。一致认为，我们不提领导不领导，但一定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起模范带头作用，特别要在学毛著、破私立公方面作群众的表率，决不能把共产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只要我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就能带领大家前进，就在实际上起了领导作用，担任不担任领导职务就无所谓了。五位党员都有一个愿望：组织起来，共同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整训后，张春富、唐正学和北医的许长安、徐永安、张玲、张灏东离开大队伍，走自己的路，剩17人按原计划前行。

12月1日晨离开文家市，朝井冈山方向前进。当天上午8时许即越过湖南省界，进入江西，一天走了120里左右，到福田公社住宿。2日中午经萍乡到安源，参观了1921年12月毛主席第一次来安源的住处、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期间（9月17日）刘少奇同志代表路矿工人与资本家谈判的大楼、1923—1924年间修建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中国工人自己办的第一个俱乐部）旧址，以及安源煤矿横道矿井口（东风大巷）；当晚住安源煤矿接待站。后经六市公社、莲花县城，于5日下午7时多到达1927年9月29日毛主席改编秋收起义部队的永新县三湾村。这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每天要接待上千名红卫兵战士，给三湾人民带来巨大压力，也给小小山村增添了无限光彩。我们队的14位男同志被安排在一户老表家里，与其他单位的10多位同志一起住在摆着两副棺材的厅堂里；吃饭则要到1里多路外的接待站，在那里等吃饭的有好几百人，我们自带牙杯当饭碗，随便找根棍子折半做筷子，排了好长队才吃上饭，这一餐饭吃得好辛苦，不过也很有意义。晚上，20多个人躺在棺材下睡觉，更是平生第一回，真有意思！6日早间向老表买了一些

白薯借他们的锅煮着吃，之后又上路奔宁冈县城而去，下午1时许到接待站安顿下来；午饭后参观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师的龙市“红军会师桥”，1928年2—5月毛泽东同志居住和办公处（亦是朱毛会师后朱德同志居住和办公处，还是1928年2月21日中共宁冈县委会成立后县委和团县委的办公处），龙市红军会师广场——1928年5月4日在此举行庆祝红军会师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7日上午冒雨向井冈山北麓的茅坪挺进，11时许到达。我们置吃、住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顾（在此逗留的人员多得不得了），参观了湘赣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谢氏慎公祠）：这次会议于1928年5月20日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举行，作出以井冈山为中心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等重要决定；毛泽东同志旧居（八角楼）：三湾改编后，毛主席进驻茅坪一带，从此时至1929年1月，经常在这里住宿和工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在此写成的；红军烈士公墓：安葬在新城战斗和七溪岭战斗中壮烈牺牲的50多位红军指战员墓；红军医院旧址和湘赣边区特委办公室旧址，还到红军医院旧址听当年毛主席的老房东谢槐福老人讲述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小故事（毛主席打草鞋的故事，给谢老人家送棉袄的故事，给邻居谢殿娘送火炉、煤炭的故事）。

8日早7时30分离开茅坪，奔向井冈山中心地带茨坪。10时40分登上黄洋界，正好雾散天晴，站在黄洋界上眺望四周，简直像在天堂一般，又仿佛置身仙境，我感慨万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此时的激动心情。我们在黄洋界逗留1个多小时，瞻仰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听一位老同志介绍当年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黄洋界保卫战的情景。12时许继续前进，走了30多里，于下午3时到达茨坪。由于来此参观、接受教育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有成千上万，据介绍，到今天为止，小小的井冈山地区已容纳了四、五万参观者，超出其接待能力四、五倍，吃、住更加困难。我们自寻了一个在建的大帐篷（用竹子和油纸搭成），找来一些稻草铺上，就算有了宿舍；随后每人领到3个馒头作一餐。我们前后在茨坪呆了4天：在井冈山电影院门前听取有关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广播；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创办于1928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公卖处旧址、红四军军官教导

队队部旧址、创立于1928年的红四军军械处旧址、红四军军部旧址；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包括堂屋（毛主席曾在此同井岗山的苏区干部开过会、并作了报告）、寝室兼办公室（《井岗山的斗争》一文就是在此写成的）、用膳处；还凭吊了红军烈士墓：1929年1月毛主席率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国民党军队窜犯井岗山，小井红军医院遭到突袭，100多名伤病员光荣牺牲，井岗山人民以极大的勇气将死难烈士安葬于小井，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井岗山人民修建了烈士墓，将烈士遗骨迁葬于此；瞻仰了井岗山革命先烈纪念塔。此后，又到距茨坪10里的大井，参观了毛主席旧居（一栋民房）：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间，毛主席经常住在这栋民房里。1929年2月，这栋民房七次被烧，只剩一堵残墙及屋后的海罗杉和柞树两棵树；几十年来，当地的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堵残墙，用树皮盖住墙顶，使它保存了下来，1960年照原样修复这栋房子时，将这堵墙嵌入新墙之中。参观了毛主席读书石：毛主席住在大井时，经常坐在这块大石头上读书、思考问题。参观了红军医院诊疗所、候诊室旧址，以及阶级斗争展览馆。随后前往小井参观红军医院遗址和伤病员殉难处。10日下午，我们长征队的全体战士到茨坪的红军烈士墓前敬献花圈，向革命先烈庄严宣誓。11日上午7时30分许离开茨坪，经毛桃、大坑，12日下午到达遂川县城，被安排在红卫小学住宿。在此作短暂整训，总结前阶段活动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改选领导人员。经一番酝酿讨论，推举刘嗣安、何家春和我为新的领导成员。利用全队分散活动之机，我们5个党员聚在一起开了个党小组会，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党员如何起模范带头作用问题。一致认为这个党小组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并且要真正起核心作用；要把牌子亮出去，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5日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美国强盗飞机连日轰炸河内、炸死炸伤400多名越南同胞的消息，我队人员无比愤慨，当即联络了在遂的20多个长征队，并得到遂川县委、县人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县委谭书记和县人委章副县长专程来到红卫小学，以普通战士的身份接受我们分配的任务），于上午11时40分左右在县人民医院礼堂召开“愤怒声讨美帝轰炸河内的滔天罪行大会”，相关长征队全体队员、遂川各校革命师生、遂川县委和县人委

工作人员共 1000 多人参加大会，谭书记（县委第一书记）、章副县长，以及志愿军战斗英雄刘雅伦等出席大会。我们队和其他几个长征队的代表组成主席团主持大会，10 多位同志代表十几个单位发了言，最强烈地抗议美帝的侵略罪行，最坚决地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刘雅伦讲了话，表达了全体革命战士彻底战胜美帝强盗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大会通过了给越南人民的声援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1000 多名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举着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牌和彩旗，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等口号，绕着遂川县城游行，持续 1 个多小时，威震遂川县、影响传四方。游行结束前，我们长征队进行了街头宣传，表演了几个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博得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这是遂川县少见的一次大集会，对遂川的工作是个很大的推动。

16 日早离开遂川县城，冒雨向万安县挺进；下午 6 时许抵赣江边，乘小船过江，随后到万安县红卫兵接待站安顿。我们在万安县活动了一个星期，最重大的一件事是策划、开展了罗塘公社黄岗大队斗争“四类分子”大会。我们从几方面调查了解该大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情况，尤其是“四类分子”的状况，制定了行动方案：决定斗争 5 个“坏蛋”，即罪大恶极的不法地主分子胡宗厚、恶霸富农分子罗定湖、作恶多端的大混蛋孙训濂、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肖相、历史反革命分子和一贯利用封建迷信毒害百姓的坏蛋肖升三；给全大队 30 多个“四类分子”钉门牌。这个方案得到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和武装部长的赞同（公社党委提供了 35 个“四类分子”的牌子），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经过周密准备，于 20 日下午，在第五生产队的一个大场地上召开黄岗大队群众大会，斗争上述五人，黄岗大队社员和本村晓瑞小学的革命师生共数百人参加大会。五个斗争对象低下戴高帽的头站在群众面前，其他“四类分子”列队站在一旁陪斗。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不断。该大队副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首先讲话，陈述大会意旨，揭露五个“坏蛋”的罪恶；接着我代表长征队讲话，简要阐述阶级斗争规律，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痛斥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欺压贫下中农、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滔天罪行，严厉警告他们：只许规规矩矩、

不许乱说乱动，谁要乱动，就叫他见阎王，热情歌颂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申张贫下中农革命正气，为贫下中农撑腰。最后振臂高呼：“打倒地富反坏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贫下中农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随后勒令五个“坏蛋”逐个坦白交待其反革命罪行。由于群众认为他们的态度“极不老实”，红卫兵们逐个敲打他们，令他们跪在地上。随之而来的是游街，本村红卫兵战士押着五个“坏蛋”走在前面，革命群众紧随其后，绕着村子转，“打倒地富反坏分子”的口号声接连不断，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吓得五个“坏蛋”浑身发抖、丧魂落魄，革命群众则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游到孙训濂家门口，红卫兵战士令五个“坏蛋”跪在地上，一伙人冲进孙家屋里，敲墙壁、挖地板，翻箱倒柜大搜查，结果什么可疑的东西也没找到；离开孙家，继续游街，到了罗定湖家门口，又是一伙人冲进去搜了一番，同样一无所获。这期间，一部分红卫兵战士和青年积极分子分头去各个“四类分子”家钉门牌……整个活动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至5时30分左右告一段。我们把善后工作交给生产大队和本地红卫兵们，嘱他们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即回罗塘公社所在地。21日晚，县委接待站在县电影院组织大型联欢会，在万安的几个长征队和万安县的革命群众千余人参加，并分别表演了文艺节目。我们队的节目占全部节目一半左右，演得相当出色（北医的王诗明扮演自编的《牢记阶级苦》和《不忘血泪仇》两个节目中的讨饭小孩，非常逼真，打动了许多观众，不少人为之落泪），博得千余观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是我们队出征以来最成功的一次表演，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22日早离开万安县城，走向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兴国县**，23日下午5时许到达县城，被安排在第一接待站（兴国县委党校）住宿。在这里，迎来了我入党一周年纪念日（12月24日），回顾一年来的历程，心潮澎湃、意气风发。24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几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蹟：文昌宫——1929年3月毛主席来兴国后，在这里主办了一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时1个月，培训了47名青年干部；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列着大批革命烈士的

遗像及其事迹介绍。二次内战时期，小小兴国县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有16000多人，个个都是堂堂铁打英雄汉。女英雄李桔（桂？）荣死得尤为壮烈：惨无人道的匪徒用刺刀挑去她的阴部、割掉她的乳房，将10根梭镖插在她身上，活活地把她砍成四截，她一声不吭、英勇死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鸡心岭——1929年3月毛主席到兴国的第二天即在这里召开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发表了重要演说；陈家祠——1930年3月间，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这里举行了兴国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革命烈士陵园。听了1927年入党的革命老人李应奎介绍兴国革命斗争史和毛主席作长冈乡调查的情况。这位老前辈曾在毛主席指导下担任消费合作社主任多年，做出突出成绩，受到毛主席表扬；他曾四次见到毛主席，同毛主席谈过话。他讲毛主席的故事充满感情，很具体、很生动，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下午，前往离兴国县城10里地的长冈乡，参观了二次内战时期长冈乡苏维埃政府旧址、长冈“列宁小学”旧址（1933年10月，毛主席率中央调查团从瑞金来兴国，在长冈乡作农村调查，毛主席和调查团同志就住在这里的楼上，并在教室里开了两个晚上的调查会。后来，毛主席写成著名的《长冈乡调查》），还参观了1928年冬毛主席主持召开兴国、宁都、永丰、太和四县党员积极分子会议的旧址——燕子窝徐家祠。当晚住长冈乡接待站。25日早离开长冈乡，经于都曲洋，26日傍晚到达紧挨瑞金县城的九堡接待站。这一天是毛主席73岁生日，当晚我们同公社所在地一个生产大队的青年以及其他几个长征队的同志们举行联欢会，共庆毛主席73华诞。首先请一位据说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讲革命故事，又请另一位“老革命”唱战争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随后我代表我们长征队作简短讲话，强调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夺取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着重论述今天庆祝毛主席生日的目的：一是激发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二是响应林彪同志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特别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真正做到“手里不离毛主席的书，口里不离毛主席的话，

头脑不离毛主席的思想，行动不离毛主席的指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一代新人；三是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四，对于我们长征队来说，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彻底革命精神，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南昌大学长征队的代表也讲了话。之后，几个单位分别表演了文艺节目，热情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整个活动进行得不错，很有意义，只是那个所谓“老革命”讲的“革命故事”有些离谱，东拉西扯不像样。27日早饭后离开九堡继续前行，11时许到达沙洲坝。这是1933年4月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的“红都”，我们参观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毛主席向大会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又作了大会结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其中一部分。大会继续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参观了一口井——1934年毛主席帮助沙洲坝人民挖的第一口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吃水问题。后来这口井被称为“红井”，井边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 时刻想念毛主席”。我们队以此为素材编了一个节目，在后面途经的一些地方表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参观了1933年4月至1934年8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毛主席办公处旧址——毛主席在此写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还到距沙洲坝2里地的乌石垅参观了1933年4月至1934年8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总司令办公处旧址。下午4时多赶到瑞金县城，被安排在一个生产队的一间小屋里；28日上午，参观“瑞金革命纪念馆”和“革命烈士纪念馆”。下午，前往距瑞金县城10里地的叶坪。这是1931年11月至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我们参观了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处旧址谢家祠：1931年11月7日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新成立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就设于此；参观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毛主席办公室旧址、红军烈士纪念亭、叶坪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以及

毛主席 1932 年夏天同群众一起劳动、车水的池塘等，还听接待员介绍毛主席在这里的许多动人故事和当地群众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事例。傍晚回到瑞金县城。29 日下午转移到叶坪，被安排在一队，分在新村和老村两处住宿，并从 30 日早餐开始分散到贫下中农家吃饭。此后一个多星期，我们以叶坪为中心开展活动，主要是参加队里的社员会和集体劳动，慰问军烈属和革命前辈，向敬老院的老人拜年，访问革命老人、听他们讲革命故事，其中一位叫欧莲秀的老妈妈的经历使我们大为感动。欧老妈妈在二次内战时期深得毛主席关怀照顾，对毛主席有着极深的感情。红军北上后，白匪军窜犯叶坪，烧杀抢劫无恶不作，革命文物被毁坏殆尽，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拆得七零八落，刻着毛主席题词的石材被砸成碎块块。老妈妈见此情景，又气又恨，她趁夜黑天没人看见，到纪念塔废墟处寻觅，竟翻到刻着“毛泽东”三个字的一块小石头，她如获至宝，赶紧脱下外衣包起来抱回家，冒着杀头的危险保存起来，直到解放后才拿出来交给人民政府。老妈妈今年 74 岁了，身体不大好，找她的红卫兵又特别多，她讲起话来非常吃力，可是为了教育后一代，她还是满腔热情、不厌其烦地讲述当年的情景。她满怀深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诉说：毛主席真好，毛主席在这儿住 3 年，我们跟着享了 3 年福，毛主席的恩情不能忘。为了不忘毛主席的恩情，为了保存毛主席的名字，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红要红透心、革命要革到底。她勉励我们“照毛主席的样子、接毛主席的班！”

1967 年元旦，全队 17 人，即李吉荣、杨秉文、王诗明、刘嗣安、牛玉秋、胡冬初、林俊德、邱一兵、朱维群、侯建华、张宏炎、高明光、李宗惠、何家春、陈海泉、谌馨荪、靳竹林在叶坪的炮弹形“红军烈士纪念塔”前合影留念。元旦之后，谌馨荪、李宗惠两位老师离队返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王素智、谢德新两位女同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女教师闫延生加入我们的队伍，几经变动，不仅没有减少，还多了一人。我们轮流进瑞金县城看大字报，了解当地和外地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我和李吉荣还参加了城里召开的进一步批判瑞金县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全体革命同志行动起来掀起文化大革命新高潮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暨平反大会”。我们还根据调查获得的材料，起草了两份大字报：

一份批判叶坪接待站助长资本主义泛滥的行为，一份揭露所谓“老革命”的二流子谢成秀的丑恶咀脸，在一场联欢会上宣读；教训了一户地主家属。到叶坪农业中学看大字报，作发动工作，协助该校的革命学生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教员。搜集、整理了一本毛主席的小故事，印刷了300册。联络其他长征队，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表演了不少文艺节目，吸引了许多观众。

1月7日下午离开叶坪继续前行，当晚到达高围，住高围接待站，次日早饭后到云石山参观红军长征的起点梅坑；9日中午抵于都县城，被安排在第二接待站，即于都中学。在这里，除参观红军长征前夕毛主席的住房等几处革命遗迹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翻印搜集来的毛主席《农村调查》文集，费了很大气力才印了出来；二是参加在于都剧院举行的联欢会，我们队表演了八、九个节目，很受欢迎。

1月12日下午4时30分离开于都向赣州进军。这是出征以来第一次夜行军，大家热情很高、劲头十足，都想通过夜战得到一次较大的锻炼。一踏上征途，即飞速前行，头1小时走了10余里，天漆黑时走完30多里，到罗坳接待站，在此吃晚饭；8时许继续前进，这一程就有些困难了，但是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用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互相推动，很快又甩掉了40余里，13日零点15分到达江口接待站，我们叫开了接待站的门，进去歇脚，烤自带的馒头充饥；凌晨2时许重新上路，这一程更困难了，大家又晒又乏又冷，好些同伴边走边打瞌睡边做梦，浑身发抖，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迈步向前，大伙儿一段接一段地读主席语录，用伟大统帅的亲切教导互相激励；一个续一个地讲革命故事，用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互相推动；一遍又一遍地唱革命歌曲，用威武雄壮的激昂旋律互相鼓舞……迈出了一步又一步，越过了一村又一村，黑暗在我们行进间不知不觉地消退，曙光在我们奋斗中悄无声息地降临。黎明到来了，朝霞出来了，我们在初升太阳照耀下，以最顽强的毅力走完最后一程，于清晨7时40分到达赣州车站饭店（接待站）。这样，我们就在一夜之间走了130里路，费时15小时10分钟（包括两次歇脚近2小时），这在我们行军史上是第一次；对于大多数同伴来说，也是此生头一回，大家非常兴奋，为之热烈欢呼。此后，

大家分头深入赣州日报社、广播站、各造反组织了解情况；到江西冶金学院同治院“东方红”战斗团、赣州市大中学校革命师生统一指挥部、全国赴赣革命师生联络委员会取得联系；分3组到几家大型国营工厂，下车间同工人一起劳动。我与朱维群、胡冬初、张宏炎、闫延生、王素智、谢德新一个组，到有1200多工人的赣州冶金机械修造厂，三位女同胞下铆焊车间；我们四位男子汉下锻造车间，胡、张为一班，我和朱维群为另一班。第一次胡、张上早班；我和朱上晚班，从下午3时30分到夜12时。锻造是把铁块打成各种形状的成品、半成品，包括炼红铁块和锻造两个环节，我初次上班，任务是从火炉里夹出通红的铁块，递给工人师傅锻造，直到下班都是干这个活。这是我第一次到工厂劳动，很有意思，很值得纪念。我们在此上了两班，随后转到杨秉文、靳竹林、高明光、牛玉秋、王诗明、何家春下的赣州精选厂，在选矿工段磁选班劳动了三次（上了三个班）。每到一处都同那里的工人密切接触，作些调查研究，进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宣传。

24日，长征队的步行串连告一段，人员自行组合，自主行动。我和刘嗣安等乘汽车前往南昌，在此活动了两天。26日乘火车奔上海，27日中午到达。在上海活动了3天，参观了位于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108号）的中共一大会址，以及鲁迅博物馆；同刘嗣安分别探望了丁雪荣的姨妈、屠新阳的父母，我还应邀独自去了屠新阳家一趟，受到她父母的盛情款待。30日上午乘火车离开上海返北京，2月1日晨到达北京站，历时两个多月的外出串连结束。

戚本禹介入人大

1967年2月21日，我班人大“三红”人士×××找我，声称代表系“夺权委员会”了解我交党费的情况，我不买账，双方争吵起来，无果而终。我系的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等组织（“三红”）于2月12日搞了个所谓“夺权委员会”，把系里的党、政、财、文权抓到手里（其实这些权力早就不存在，如果还有点什么权力，也在他们手里），并责

令全系师生员工服从他们的领导，按他们定的调子跳舞。我和一大批师生员工认为这个“夺权委员会”是非法的，不予承认。

2月22日晚，参加在大教室召开的“新人大公社”成立大会。“新人大公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主体，包括了北京公社、遵义兵团等组织，实际上是原“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保郭（影秋）派”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我校的群众组织经过半年多的分化、重组，终于形成以人大“三红”（主要负责人孔宪龙、刘庆库）为代表的一方和以“新人大公社”（主要负责人赵桂林、张祖义）为代表的另一方两大派对峙的局面。

3月2日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我校召开两方面代表座谈会，并在3日凌晨来到新饭厅向全校师生员工发表讲话。他指出，无论是新人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还是“三红”，都是革命组织，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革命同志，是自己人或朋友，而不是敌人。人大革命师生的头一个敌人是孙泱，第二个敌人是郭影秋，第三个敌人是胡锡奎，这是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人物，还会有一些；另外，历史系的胡华之流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些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打倒。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革命群众之间长期打“内战”，这些敌人并没有打倒，孙泱的反革命气焰还很嚣张，郭影秋还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胡锡奎的问题还没怎么触动……人大阶级斗争的盖子是揭开了，但揭得很不彻底，不深不透，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人大的问题是所有高等院校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戚本禹由此谈到对我校两大群众组织得失的看法。他说，郭影秋的性质以后不管怎么定，保他都是错误的，揭他、反对他是正确的。新人大公社方面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而人大红卫兵方面则是正确的，他们揭得很积极。但新人大公社的同志承认了错误，造了反，也就行了，不能再叫人家“保皇派”，铁杆、钢杆，应该允许人家革命嘛！同样的，“三红”在康老问题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迷失了方向，认识错误又还不够，但也不能把它一棍子打死，把它当作反革命组织，应该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双方不应当再互相攻击。针对我校的具体情况，戚本禹提出四条建议：

1. 立即开门整风，多作自我批评，对自己多看缺点、错误，对别人多看优点、长处，

学习人家的长处；纯洁队伍、统一思想。

2. 在整风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实现大联合。

3.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锋芒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决不能扩大打击面，把所有党团员、干部都打倒。应该相信大多数党团员是好的、比较好的，是热爱毛主席的，应该解放一批不是黑帮的“黑帮”。

4. 注意斗争策略；不许乱砸乱抢、损坏国家财产；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保守国家机密。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对我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次正式表态，对此后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3月10日、11日下午、14日下午，根据戚本禹讲话精神，经过几方面代表协商，我班进行联合整风，总共开了两天会。名为“联合整风”，实际上是×××为主的人大“三红”一方主持，对班党支部进行总清算，对大多数党员（除杨庆生、袁忠智、刘启用外）进行大批判、大斗争。“三红”人士个个慷慨激昂，一个接一个跳起来愤怒控诉班党支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及过去四年对他们的所谓“残酷迫害”和“法西斯专政”，把过去的案全部推翻，过去好的，在他们看来都是坏的；过去坏的，他们认为是真正好的。全班党员，除上述3人，无论正式还是预备，都受到痛斥，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党员都是只对刘、邓有感情，对毛主席毫无感情；都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的刽子手，而决非革命者；都是两面三刀的资产阶级政客，而决非老实人，简言之，都是假党员、假典型，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最耸人听闻的政治术语都用上了。其中尤以我和伍连连为甚，我们俩被他们视为“最顽固、最恶劣”者，是他们重点整治、收拾的对象，几场会都集中火力对准我俩，从今天骂到昨天，又从昨天骂到前天，从班内骂到班外，从校内骂到校外，什么老底都兜了出来，什么罪名都加到身上，什么“帽子”都扣到头上，其态度之严厉、言词之刻毒，殊为罕见。14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主持者还请了外班、外系的许多同学来观摩，以便推广“经验”。这是我有生以来遭到的最恶毒的攻击、最严厉的批判，尽管充

满污蔑不实之词，多属捏造事实、栽赃陷害，或捕风捉影、夸大其词，我心里极不服气，却强摀下怒火，平静地听着，既不澄清，更不反驳，随他们骂去，直到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好骂的、也骂不出声为止。我经受了一次考验，受到深刻的教育。伍连连会上一声不吭，任由那些人呵斥、痛批，会后心里难受，掉了泪；我找她聊天，耐心、诚恳地劝说、安慰她，她想通了不少问题，舒坦了许多。这场“整风会”在“三红”人士骂够班党支部和“新人大”人士之后收场，据说为大联合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已经联合了起来。我却认为，这场“整风会”不仅没有使两派同学之间的隔阂和磨擦得以消除、促进团结，反而加剧了矛盾和对立，离大联合不是近了，而是远了，实现大联合的路子更加艰难曲折了。

5月，我校以“新人大公社”为代表的一方和以“三红”为代表的另一方，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日益严重；我班上的两派同学不时争执、情绪激烈，谁也不示弱、谁也不退让，新入大的同学转移到北一楼上10号房活动，我和黄民成、刘嗣安、杨绍竹等同学住到那里。

5月19日，与我系6502级新人大同学孙明晨离京前往乌鲁木齐，拟找新疆大学副校长，原我校党委常委、马列主义基础系主任云光了解我系的历史情况及一些教工的问题。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只同云光见了一面，谈了3个多小时，收效甚微，得不偿失。6月5日夜回到北京。

两派进入对峙期

9月1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几位领导接见“天派”系统的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人大“三红”、民院“抗大”等组织的代表，他们在讲话中提到，人大“三红”里有很多特务，孙泱是人大最大的特务，“三红”还保他呢！孙泱的秘书就是“三红”的，他经常拍照大字报给孙泱送去。“三红”负责人刘庆库（后改名刘梦溪）企图辩解，遭到江青严辞痛斥，她说，你们背信弃义，两面派，我看你就不像个学生，而像教工，……“新人大公社”获悉后，于17日采取非常措施把孙泱及

其老婆石崎、秘书闫志民抓了起来，并抄了他们的家。10月6日凌晨，孙泱在关押处新图书馆大楼（“新人大公社”总部）的一间小屋里上吊自杀。“新人大公社”的头头们有些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起初严密封锁消息，随后接连开会，商讨对策；人大“三红”得讯后大做文章，大叫这是一起反革命谋杀案，是一大阴谋。这是“文革”期间人大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深远。

10月12日，离京回福建。校内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情绪不断加剧，个人无可奈何，亦无所事事；家里则担心我的人身安全，父亲于10月10日来电报，谎称祖母和母亲生病，让我速回。14日抵福州，先在省人民医院父亲处呆了两天，后回惠安老家住了20多天，重返福州父亲处，又住了20多天。11月30日傍晚乘火车离开福州，12月3日晨4时回到北京（因蚌埠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耽搁了6个多小时）。

12月24日下午，叔父来校看我。他作为福建三明地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福建问题而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昨日抵京，住解放军后勤学院。

1968年1月29日，农历丁未年十二月三十，除夕。上午叔父来校找我，我陪他到中宣部宿舍拜访洪禹同志，同洪禹同志长谈。下午，南安县委副书记陈天必、三明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等同志先后到来，又一起谈了一阵。我于4时许先行告辞回校。

除夕夜晚，新人大校园热闹非凡。北一楼上各系各班同学忙着包饺子，筹备欢度佳节；新人大公社总部大楼灯火辉煌、锣鼓喧天、礼炮轰鸣，游园晚会正在那里举行。在校新人大战士无不欢天喜地、热气腾腾；我6202支队除沈大德、吴廷嘉两人外调未回，刘启用、杨绍竹生病在家外，都到了，丁雪荣、宋柱修、张联瑜还是刚从外地执行任务返京的。这么多同伴欢聚一堂，近几个月来还是头一回，大家都很高兴；加上有两位外地的解放军战士参加我们的聚餐（伍连连到湖南外调时认识的，最近进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今天来校看她），更给我们的除夕夜增添了喜庆气氛。我们一拨人在宿舍包饺子、吃饺子，另一拨人到总部大楼游园会值班、游玩，过一阵轮换，最后合在一起吃糖果、花生，打扑克，直到次日（戊申年正月初一）凌晨3时才歇息，好生痛快！这是我上大学以来在京过的第

五个除夕，很可能是在京过的最后一个除夕。过得很愉快、很有意义！

2月25日（星期日）上午，叔父来校找我，我陪他到对外文委看望惠安乡亲曾德聪，先后去了三次都没找着，沿途谈了许多问题。他提醒我注意，阶级斗争是异常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变得复杂一些。青年人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往往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他希望我：一要经受得住最严厉的批评，哪怕是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也要听，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善于从别人的意见中汲取合理的成份，改进自己的工作；二要多看别人的长处，虚心向一切有长处的同志学习。这些意见很有针对性，很值得我考虑。

4月下旬至5月上旬，校内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继续升温，武斗一触即发。新人大方面，以新落成尚未投入使用的图书馆大楼（称“红楼”）为指挥部，所属人员陆续集中到北楼、二处，不少人占住了林园的教工宿舍，把单元房打通、构筑了防御工事，还制作了钢钎、铁棍、大刀等武斗工具，在交通股开设了一个战备食堂；人大“三红”方面，以教学大楼（称“白楼”）为指挥部，人员集中在东风楼、南楼等处，把大批贵重物品转移到校外，大筑武斗工事，赶制钢钎、利刀，长、短剑等凶器，甚至制造炸药、手榴弹，盗取各种枪支，并且采取卑劣手段骗取了校幼儿园的2万多斤口粮，为武斗作了充分、周密的准备。双方数次短兵相接，各有伤亡。

5月14日凌晨2时许，“三红”派重兵进攻校工厂，妄图抢夺器材以为制造凶器之用，新人大战士奋起保卫国家财产，双方激烈争斗，语文系分社负责人王锡忠被进犯的暴徒刺死。全体新人大战士悲痛万分，下午在交通股召开追悼会，深切悼念为保卫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战友。

5月上旬至中旬，叔父几乎每天来校看我，对我校两派对立的局面及武斗的气氛深感忧虑，十分担心我的安全，他反复同我周围的同学、老师谈话，劝告他们停止武斗。眼看劝阻无效，他考虑把我带离学校武斗场所，让我在他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结束时（5月中旬）跟他回福建。经他耐心做工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5月18日上午他来校同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道别，以让我送他到火车站的名义把我带离学校。当晚，我住洪禹同

志家，叔父回后勤学院办理离院手续。19日上午我离开洪禹同志家到北京站与叔父会合，他匆匆赶去向洪禹同志辞行，1个多小时后回来。据介绍，洪禹同志一家以最大的热情接待他，洪禹同志恳切地与他交谈了许多问题，还把他送到公交车站，并请他给父亲和刘祖丕、刘荣喜同志带礼物。叔父非常感动，一再说洪禹同志是他遇见的最好的一位首长，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乘12时35分的45次列车离京，21日下午抵福州。27日随叔父到他工作的明溪县，住了半个多月，6月14日离开；两度返惠安前林老家，三次经福州父亲处。7月25日夜返京，暂住洪禹同志家，了解、观察学校武斗的形势，7月28日夜方回到学校新人大同学住的林园7楼。就在这一天凌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又称118厅）召见了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严厉批评他们煽动和组织武斗的行为，责令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武斗。同学们向我传达了 this 重要信息。看来我返校正当其时，武斗之风就要平息了。

8月22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0多人进驻中国人民大学，执行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的使命，对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一年乃至两年的毕业生进行分配。

8月26日下午，参加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召集的全体毕业生（67届及66届尚未分配者）大会。宣传队负责人作毕业分配动员，基本精神是：不自报、不公议，由宣传队和分配小组决定，8月底完成。

8月26日—31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分配小组制定毕业生分配方案，上报北京市革委会审批。

8月29日上午，宣传队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欢呼我校实现大联合，正式宣布解散新人大公社、人大“三红”及所属一切机构，上缴全部派物。旧的组织形式不适应新的形势，解体了，大联合的局面形成了，人大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9月1日（星期日），前往中宣部向洪禹同志一家告别。估计毕业分配方案即将公布，随后就要离京奔赴工作岗位，须抓紧与亲友道别。洪禹同志和叶茵同志盛情款待我，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的谈话，还带我到中宣部大院散步、照相。晚间临别时，应我的请求，

洪禹同志将毛主席1946年3月13日给他的复信的照片一套（3张）送给我作纪念；还让我选取了他保存的陈伯达手书中的3幅：一副写着杜甫《登岳阳楼》诗的两句“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的对子，一张写着“海阔纵鱼跃 天空任鸟飞”且加盖“陈伯达”印章的条幅（可惜这三张有很高欣赏价值的墨宝，连同刘祖丕同志送给父亲、存在我处的陈伯达的另一幅墨宝“每至临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迫于压力而焚毁）。

9月2日上午，参加全系师生员工热烈欢送67届毕业生即将踏上工作岗位大会。

随后回班，宣传队负责毕业分配工作的解放军干部陈永才宣布了经北京市革委会审批的毕业生分配方案。我班31人，分配29人；伍连连由于犯了所谓“死保反革命老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罪”，黄济福由于“思想一贯反动，今年二月间又疯狂攻击谢富治副总理”，不予分配。我被派往广西，具体单位待定，离校后先到湖南洞庭湖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按规定，已分配的毕业生必须在9月5日前后离校前去工作岗位报到。相处6年，在近两年多的共同战斗中结下深厚情谊，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襟怀坦白、亲密无间的战友就要分开了；这一次分手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是永别，同学们极其难舍！为了留下永久的纪念，我们13人：张联瑜、刘启用、宋柱修、沈大德、丁雪荣、杨绍竹、冯万英、吴廷嘉、钱世文、刘嗣安、林俊德、张金福、黄民成，加上沈大德的两个妹妹和钱世文的一个妹妹共16人，下午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玩，拍了几张照片，后到北京烤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我们这个战斗集体最后的一次聚会，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一次欢聚。■

作者是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62级学生

【口述】

■

【口述】

我是个“保郭派”

张林南口述

吴淮阳记录

我祖籍河北省邢台地区平乡县东田村，祖父是地主兼高利贷者。父亲就读于河北省邢台第四师范。他1931年加入共青团，任邢台地区三个学校的团总支书记。1932年在领导学潮中，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转至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坐牢四年，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坚持狱中斗争，在狱中转党，1936年10月出狱。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后南下，任中共豫西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解放后，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计委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1956年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1月8日病逝。我母亲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河南省妇联组织部长，全国妇联福利部、国内工作部副部长、代部长，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年调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任研究员，因为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大跃进、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曾受到批判。

1964年8月，我收到人民大学入学通知书，录取我为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入学后不久就“下连当兵”，有一位和我编在一个班的同学告诉我，她第一志愿报的是国际政治系，却被分到了党史系，我俩一通气可高兴了，我俩可以换系了，都可以上自己喜欢的系了。入学教育结束，我俩去找分管教务的副校长，要求换系。副校长把我俩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我俩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副校长将我找去，他说：“我和你父母亲一起工作过，你考人大我知道，你考得不理想，是你们学校把你推荐来的，学校介绍了你的情况，说你写了入党申请书，政治热情高。为什么把你分到国际政治系？因为你政治上可靠，家庭出身好，这个系的人将来是要外派的。那位同学有海外关系（注：

她父亲是北大教授、印尼华侨），因此不能上国际政治系。”我听了副校长的讲话，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一方面下决心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另一方面我也为那位同学感到不平。我们高中班有10个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出身不好”未被录取，我也为她们感到不公平。

人大国际政治系一共有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专业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班35个人，两个女生，有5个干部子弟，其他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一半以上是原来中学里的团支部书记。第一学期的班干部是指定的，我当团支部委员。入学第一天，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一个部队用的小针线包，一个班一套修鞋工具、一套理发工具。学校要求我们保持和发扬“人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入学教育一是劳动——拔校园里的草；二是看《早春二月》、《以革命的名义》等电影，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阶级斗争观念，立志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三是端正学习目的，每个人都要讲讲自己为什么考“人大”。有的同学说为了将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想当外交官，有的想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还有一个同学说上了人大可以看《参考消息》……大家敞开思想，讲得既率直又天真。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入学动机很单纯，就是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10天后，就让我们“下连当兵”，到昌平第三工程兵学校锻炼一个月。我们除操练外，还学习了摆地雷阵等军事技术，大家感觉很新鲜，很高兴。

大学一年级主要学基础理论，如党史和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发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没有讲。我们班里的学术空气很浓，大家都能敞开思想，自由发表意见。在一次哲学课的讨论会上，班长发言说：“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能一分为二，那对毛主席能不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能！毛主席很伟大，但是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所以也应该一分为二。”团支部书记说：“对毛主席怎么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不能，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并列，是绝对正确的！”老师没有批评班长，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班上少数人同意班长的意见，多数同意团支部书记的意见，我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从普遍意义说，对毛主席也能一分为二，但从感情上讲，毛主席一贯正确，不容怀疑。还

有一场辩论会，那次是学习讨论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在掀起反修防修运动的背景下，周扬说：“我们需要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社会上正在兴起学雷锋的高潮，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做雷锋式的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雷锋式的人物哪一个对社会的贡献大？以班长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重要，雷锋只是普通的人，我们的目标应当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我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雷锋是革命的螺丝钉，放在哪里都能用，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让他学理论，他也能成为理论家。我们要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要向雷锋学习，做雷锋式的人物。我崇拜英雄，雷锋、焦裕禄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楷模。

我很热爱我的班集体，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同学，常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牢记毛主席干部子弟不能脱离群众的教导，虚心地向工农子弟学习，和他们交朋友，我和大家的关系非常好。有的同学们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上大学时妈妈给我买的“基洛夫”手表成了大家的共同财产，同学们轮流戴。一年级放暑假，班里有些同学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回不了家，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回家后，我和妈妈商量，请妈妈帮助这些同学，让他们能够和家人团聚。妈妈给了我200元钱，我分给了这些同学，大家高兴兴地回家了。1965年8月5日，在大学一年级暑假，我入了党。

“文革”前夕，1965年，学校组织我们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在班里的讨论会上，团支部书记将矛头直指班长，他说班长“学术走错了方向”，“怀疑毛主席，认为毛主席也可以一分为二，这是怀疑一切”，还说班长“反对学雷锋”等等，班长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俩从此分道扬镳。我看出支部书记是有意拉班上的人整班长，我不同意他这样做，我认为班长是一个好人，他并不反对毛主席，我很同情他，会上我不发言。班长被批判之后，不大和别人说话了，但是，他经常来找我讲讲心里话。他看了许多马列的原著，还指导我看一些书，我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我很佩服班长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做到像班长那样是很不容易的。

1966年6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后，大家开始给校党委和系里领导写大字报。当时，我是我们班文革小组的组长。我没有看出校党委有什么问题，所以没有写大字报。对别人贴出来的大字报，我一篇篇认真地看，发现有的大字报有不实之处，感到很生气，心想都是搞政治的，怎么能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呢？有一次，我看到系里老师写的一篇批判系党总支的大字报，里面有无中生有的东西，我就去找他们，当着这些老师的面说：“你们是教马列主义的老师，怎么能不实求是呢？那个会我参加了，我怎么没有听到你们批判的这些话？”他们无言以对。

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在团支部书记的带动下，把矛头指向了我们系的党总支专职书记（女）。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入学时，老师说：“你们毕业时将全部是党员。”但是，入党有先有后，没能在“文革”前入党的个别人就不满意，对总支书记有意见；有的同学是因为挨了批评，心里不满；而团支部书记认为他没有当选我们系一、二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因为党总支书记的原因，于是，团支部书记就领着这些人把矛头指向党总支书记，写出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大字报，他们让总支书记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甚至做出揪头发的粗暴举动，还企图砸存放档案的保险柜。我坚决反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劝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给校党委和系总支的领导写大字报，但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抱着对他们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提意见，而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泄私愤，图报复。”他们嘴上没有反驳我，心里对我肯定非常不满。

大概是7月底或8月初，党史系的几个干部子弟来找我，说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希望我们系的干部子弟也参加。我很反感他们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为此，我和系里另外两个干部子弟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干部子弟脱离工农子弟，成立自己的组织的不满，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纠正这种倾向。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几天后，以我们系四年级工农子弟为核心，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学校的这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对待郭影

秋的态度上却截然相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郭影秋的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郭影秋。我是坚决保郭校长的，因为他在人大广大师生员工中的口碑很好，他工作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对处理人民大学干部由于历史原因不团结的问题提出了“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正确方针，他对教育改革有许多新思路……。

8月份，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反郭影秋的大字报《揪出人大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郭影秋》，题目每一个字占一张大字报纸，内容空洞无物，但用词尖刻，说郭校长提出的“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郭影秋在“四清”中（郭是人大四清工作队总负责人）保护了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等。我正好看到和我一个党支部的我们系一年级的一个党员带着几个人在贴这张大字报，当场质问他：“你凭什么写这样的大字报？你的材料呢？是谁让你写的？”他说：“是党史系的某某老师让我们写的，他们有材料。”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巨大轰动。我对这种乱扣帽子的所谓造反行为非常反感，我认为在背后指使学生的老师动机不纯。这时，“四清”回来的我校师生纷纷写大字报保郭影秋，讲了许多郭校长在“四清”中的感人事迹。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决定去“四清”点上做调查研究。当时还不大会骑车的我借了一辆破旧的28男车，一路跌了数不清的跟斗，行程60多里，终于到了“四清”点苏家坨，在那里住了几天，走家串户地调查，得出了我们自己的结论：“郭影秋不仅不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不是走资派，而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回到学校后，我们几个人写了一张保郭影秋的大字报，我签了名。

大概是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陶铸主持大会，邓小平等中央首长也来参加，辩论郭影秋到底是什么样的干部，两派一对一地发言。那天辩论非常激烈，反郭派说郭影秋是四类干部，一无是处；保郭派说郭影秋是一类干部，这样好的干部少有。会前，保郭影秋的不知什么人把开辩论会的消息传到了苏家坨，结果当天苏家坨来了500农民参加辩论会。这场辩论会以后，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上说，郭影秋调500农民进城来保他。后来郭影秋就被打倒了。我们这些“铁杆保郭派”

不甘心，曾冒着大雨到国务院信访局反映情况，说明不是郭影秋调农民来保自己，说郭影秋的确是好干部，为郭校长鸣不平。

1966年9月，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大操场接见红卫兵，要求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去串联，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去。当时把外出串联的红卫兵组织了四个大队，我和我们系的十几个人作为第四大队第三中队的成员前往广州，我们之中大多数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广东省委对我们这些从北京“派来”的红卫兵很重视，安排我们住进省委招待所。我们在省委看大字报，到广州的大学里面跑，参加一些学生和群众的集会。还在公共汽车上读毛主席语录，宣传“十六条”。不久，在省委机关礼堂召开了省委的干部大会，让我们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我也作为代表之一上台发了言，讲了“文革”在北京、在大学里是怎么搞起来的，毛主席对“文革”如何亲自指导，寄予怎样的期望。并针对我们看到的广州的情况，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呼吁大家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天晚上，赵紫阳、林里明、欧梦觉等省委领导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座谈。记得我和赵紫阳还辩论起来，他说：“我们广东省是祖国的前沿，面对香港和台湾，一定不能乱，不能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我说：“我们认为广州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人们缺少革命热情，都很温良恭俭让！”想想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回家后和母亲讲起这件事，被我母亲批评了一顿，说我太偏激。

10月中旬，我们从广州北上，先去了湖南韶山，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又到了南昌，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然后坐汽车上井冈山，边参观革命圣地，边重温党史。下山时，汽车开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井冈山分校时坏了，我们都下了车。学生们知道了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后，要求我们讲讲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讲了以后，学生们感到很新鲜，激发了他们投入“文革”的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到北京和全国去串联，学校的秩序乱了起来，引起了吉安地委的不安。地委派人来调查我们的来路，说我们把学校搞乱了，把我们扣住不让走了。我们在井冈山分校住了好几天，和学生们的关系搞得非常

好。地委放我们走时，学生们送我们每人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还有竹子做的扁担、水桶、笔筒，还送了一个他们自己种的40多斤重的大南瓜。我们回到北京后，把这些礼物毫无保留地捐献给设在北京展览馆的红卫兵战果展览了。

1966年11月初我们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的人还不多，都在外面串联，所以，我们又组织了一次步行串联。这次我们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步行串联的宗旨是：重走长征路，一路搞社会调查，从事革命实践，通过实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史，自己教育自己。路线是从北京一直走到瑞金，再从瑞金开始沿着长征路线走，到达延安，最后走回北京。“长征队”人员22人，其中我们系的人最多，还有党史系、哲学系、农经系的6个同学，另外吸收了两个“人大附中”的初中生和两名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同学，年龄从14岁到28岁，党员占了一半之多。为了走完“长征”的艰苦里程，根据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指示，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选举了书记、副书记和长征队队长，我当卫生员，负责背药箱。我们背着行李、毛选和油印机、纸张，还有一套《收租院》的图片，平均每人负重30斤。我们还特制了一面写有“长征大学”的红旗。出发那天，先坐车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长征的起点，大家一起照了相，然后，就举着大旗出发了。

第一天我们走了七、八十里，到白洋淀住了下来，这里是抗日战争中让日本鬼子丧胆的大片芦苇荡。我们请参加抗日的老乡给我们讲抗日的历史……。第十天，我们到了饶阳县五公村，这是冀中平原首先搞合作化的村子。解放战争时期，耿长锁和徐树宽夫妇率先办起了互助组，以这个互助组为核心，办起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一个合作社。我们走家串户，了解历史，搞社会调查。来这里的中学生多，大学生少，而大学文科生我们是第一批。耿长锁提出一个请求，让我们帮助他们办一个展览，不然来参观的红卫兵太多，他们老得讲，耽误生产。我们答应了，开始办“五公村村史展览”。我们早上五点半起床，半天劳动，另外半天一部分人收集材料，办展览，一部分人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搞社会调查。

1966年12月，党中央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政策，我们的社会调查又扩大了几个点，扩展到深县。每天早上我们分工，有和社员一起劳动的，有到各个点上搞调

研的，晚上开碰头会，交流情况，写调查报告。在深县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看见这里一些农民特别穷，住的房子类似猪圈，床上就一张草席子，连被子都没有。而有的房子非常好，有门楼，还有二层楼的，住好房子的都是干部，群众对大队干部很不满，认为他们多吃多占。我们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要搞“四清”了。我们每走一户，送一张毛主席像，有的老乡称我们为“青天”。

不久，天津大学来了一批红卫兵，说他们是来贯彻农村文化大革命十条的。他们横冲直闯，蛮干，把耿长锁夫妇打成了走资派，把我们打成保皇派，说我们右倾。我们说：“你们要做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村里一些人受了他们的影响，想批判我们，但是没有成主流。他们的到来，完全打乱了五公村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我们对他们非常反感。

1967年2月，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要求结束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尽管我们的宏伟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各方面的收获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机会参加“四清”的人，接触和了解了农村的一些情况。我们写了调查报告，回北京后递交给国务院信访局。

回到学校后，两派斗争升级，闹得很厉害。保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新人大”，全校70%以上的学生、老师，90%的党员、干部和99%以上的工人参加了“新人大”，是多数派；反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人大三红”，是少数派。后者尽管人少，能量不小，自封为人大的造反派，视“新人大”为保守派。“人大三红”抄了郭影秋的家，想办一个展览，结果什么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抄出来，抽屉里翻出不少三年困难时期补助他的副食品票，他都没有用。他们自己说：“这只能是一个呈现郭影秋艰苦朴素的展览。”办了没几天就撤了。“新人大”将副校长孙泱打成走资派，把他关在图书馆楼的一个屋子里，有一天发现他“自杀”了。“人大三红”占领了教学大楼，“新人大”占领了图书馆大楼，各有各的广播，互相对骂，“人大三红”的开始曲是《解放台湾》，“新人大”的开始曲是《解放南方》。

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我父亲被打成了叛徒，我成了“狗崽子”。

还是在五公村时，天津大学的红卫兵带来了一条消息，他们说，查解放前的旧报纸，发现他们的校长高仰云是叛徒，他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出狱的，而且不是高仰云一个人，是一批，薄一波是其中之一。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下，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听父亲讲过他坐牢的事情，他还带我们去北京草岚子监狱旧址，他说：“我当年就是在这里住了四年监狱。在狱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敌人进行各种斗争，还坚持锻炼身体，决心‘红旗出狱’。”我父亲还保存了一张狱中难友戴着脚镣做操的照片。我也听说过，他们是“组织营救出狱”和“用特殊手段出狱”这样的话。大概是1967年3月，毛主席在批阅农业部报送的廖鲁言的材料上批示：此次运动揪出了一批叛徒……从此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以后就把1936年经北方局营救、党中央批准的经过特殊方式出狱的这些人定为“61人叛徒集团”成员。

从五公村回学校后，有一次去食堂吃饭时，在食堂门口发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大叛徒WCZ的爱女王太行，为了保她的叛徒老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击、压制革命群众造反！……王太行是刘少奇的‘黑修养’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我一进食堂，就有人喊：“打倒大叛徒WCZ！”我心里很沉重。回家问母亲：“我爸爸到底是不是叛徒？”我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你爸爸不是叛徒。他被叛徒出卖，关进邢台监狱，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至死不供。你爷爷奶奶花钱去赎他，他坚决不出狱，说：‘不能红旗出狱，就把牢底坐穿！’他当时只是共青团的总支书记，却被敌人当作共产党的要犯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他在监狱党组织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曾绝食七天七夜，和薄一波等12位难友被判了死刑，戴重镣，因国民党驻军和张学良的部队换防，死刑才未执行。他是在狱中由团转党的。他入狱和出狱的情况从来没有向组织上隐瞒，我相信你爸爸不是叛徒。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我父亲的老秘书刘叔叔也对我说：“你爸爸绝不是叛徒！”我从内心相信我母亲和刘叔叔的话是真实的，我不相信我父亲会是叛徒，但是，毛主席、党中央给他们61个人定了性，而我又

是坚信毛主席和党的，他们毕竟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啊！所以，我感到很困惑，底气不足。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怎么说，父亲的事可以先放在一边，我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又想到在深县农村调查时干部欺压老百姓的例子，说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必要的、及时的。所以，我努力说服自己，不受父亲被打成叛徒的影响，继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自觉在革命实践中经受考验。我的观点倾向“新人大”，也跟他们在一起活动，但由于父亲的“问题”，当时并未从组织上批准我加入“新人大”。

1967年3月3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到我们学校做报告，促两派大联合，要求两派坐在一起整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学校开始“三.三整风”。在我们班的整风会上，我主动检讨自己思想右倾，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把人都往好处想，因此压制了群众造反的积极性，起到了阻碍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我诚恳地希望同学们帮我提高认识。我的检查还没做完，一个同学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王太行，你不要避重就轻！最使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是你叛徒老子的问题！你为什么不作检查？！”我愣住了，血一下子涌上了头，我也本能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XXX，我告诉你，我没有一顿吃不下饭，也没有一天睡不着觉，我天天高高兴兴地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你别想诬蔑我！”那个带头造系党总支专职书记反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声色俱厉地对我说：“要是在战场上，我一枪毙了你！现在我勒令你摘下红卫兵袖章！你有什么资格当红卫兵？”我马上答：“我是父母所生，但我更是党的孩子，是根据地的老乡给我的性命！我对党的感情比对父母的感情还深，你想拆散我和党的感情，想让我摘下红卫兵袖章，从此不革命，没门！”更恶劣的是，他拿出20元钱——就是一年级暑假我妈妈给同学们的路费钱，说：“这是我借你的钱，现在还你！”我说：“去你的吧，我才不要你的臭钱呢！”就连长征队也有人批判我右倾，说我应当和叛徒父亲划清界限。还有的人说我学雷锋、学英雄都是假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人以前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仅仅一天之隔，知道我爸爸有问题了，就翻脸不认人，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通过批判我，

和我划清界限来显示自己革命。我感到不是他们不了解我，而是他们自己的灵魂中有肮脏的东西。这场大革命的确容易暴露人们的灵魂，让我看到真实的世界和人情冷暖。我认为这完全不是整风而是整人，毫无团结与联合的诚意，因此十分气愤，当即决定不再参加这样的“整风”，我推开门就走了。

正是在1967年3月，河北沧州地区发生地震，我和班里一起“长征”的两个同学、我小弟弟，还有别的班的两、三个女同学一起去沧州抗震救灾。没有人组织我们去救灾，完全是自愿的行动。

从灾区回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康生的指使下，我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骨灰堂一室被清理出来。系里的造反派抄了我的东西，从我箱子里把好朋友CH的日记也给抄走了。我又生气又委屈，回家后，找出我从初中以来的日记——记录了我8年、2900多天的生活、学习、思想，我青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全部烧掉了，一边烧，一边哭，心里埋怨我父亲，“你为什么要在自首书上签字呢？现在说不清楚了，让我连干革命资格都没有了……”我把保存的几张爸爸的相片也烧掉了。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既不相信父亲是叛徒，又不敢怀疑毛主席和中央的结论是错的。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无限热爱党、忠于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大学一年级做扁挑体手术的时候，忍住剧痛的动力是来自想到江姐在敌人酷刑下宁死不屈。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像《红岩》中那些先烈一样，被敌人逮捕了，会不会投敌叛变？我坚信不会，我会像先烈们一样视死如归！同时，我也记得，当看到焦裕禄的报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从我看到的、从母亲和叔叔阿姨们那里听到的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一心为公的人难道会贪生怕死、叛变革命吗？！我困惑和矛盾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最终的选择是：如果父亲确实是自首分子，就和他划清界限，继续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但我期待着中央还有与之不同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当党和毛主席的决策与我的朴素认识和个人亲情相对立时，我采取的态度是，努力改造自己，压制内在的本性，宁可舍弃亲情，也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是在1967年3月，我的姥姥去世了。姥姥在解放战争后期，便从老家出来跟随我父母，照顾我和1946年底出生的弟弟。她患了肠癌，送哪个医院都不收。当时，因为杨尚昆被打倒，中央办公厅被全锅端出了中南海，集中在北京郊区办学习班。母亲进了学习班，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因为我父亲被打成了叛徒，家里的暖气被停了，屋里冷的像冰窖，姥姥躺在床上疼的昼夜呼喊我母亲的名字，可家里连一片止痛药也找不着，串联回来的我守在姥姥身边，只会掉泪，束手无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在痛苦中无助地垂死挣扎，我的心也痛苦到了极点。姥姥叫了100天，终于停止了呼吸，我亲眼看到她死不瞑目。

1968年，社会上刮起了武斗风，我们学校有人大造舆论说：“两派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武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武斗没有必然性，在和平年代，在以工农子弟为主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怎么可能武斗起来呢？！当时，两派已经分开来住，“三红”的人住在学校的南侧，“新人大”的人住在学校的北侧。因为我不相信会发生武斗，仍然住在原来的宿舍（已经成为“三红”的地盘）。当年美国刚刚发生了著名民权运动领袖和平主义人士马丁·路德·金遇刺的事件，有些人就说我也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和平主义者，还送了一个“马路金”的绰号来讽刺我。后来学校形势的发展果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先是两大派在各自的广播喇叭里天天激烈地对骂，然后发展到抓对方“有问题的人”毒打，再升级到两派互相扔石头，在楼顶上打弹弓，“三红”总部（教学大楼）和“新人大”总部（图书馆大楼）的玻璃窗全都被打了个稀巴烂，两楼之间的地上都是石头。这时，“三红”的人只能从学校的正门进出，“新人大”的人只能走学校的北门，如果走错了，就有被对方抓起来的危险。有一天，我在食堂吃饭时偶尔听到“三红”的人说要抓我们班“新人大”的一位同学（他曾犯过错误），以报复“新人大”抓了“三红”的人。我赶快跑去告诉了和我同住一屋的好朋友CH，并和她一起立即通知住在北楼的我系“新人大”负责人：“不好了，他们要抓W，抓到‘三红’总部肯定得打个半死，快去救人吧！”我俩先跑到系里去看，W同学果然已经被他们关在一个宿舍里，还没来得及往总部送。我们大声向“三红”的人喊：“你们为什么要抓人？赶快把W放出来！”这时，CH班里的一个过去曾追求过她

的男同学走到我面前说：“你一个叛徒子弟有什么资格要人？！”接着又一脸流氓像地凑到CH脸前说：“先检查一下你的叛徒感情再管别人的事吧……”吐沫星子溅了CH一脸，CH气坏了，伸手给了他一个耳刮子，那个男同学一把将CH推倒在地，我冲过去扭住他喊“你敢打人……”听见动静，从宿舍里立刻跑出一群人來跟我们俩打，我和CH真是不要命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这时，我系“新人大”的人赶来了，赶快拉架。最后还是把W给要出来了，而我们俩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架回了宿舍，好几天疼的都不能动弹。这位被救的W同学从内心感谢我们，在我们养伤期间，天天给我俩打水送饭。

人大的武斗继续升级，从扔石头的初级阶段很快进入使用武器的高级阶段。有一天晚上，“新人大”的人正在校办工厂里制作长矛，“三红”武斗队的人偷袭进来，用长矛刺“新人大”的人，一位“新人大”的同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长矛戳到了脖子上，立刻血流如注，当场死亡。第二天“新人大”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追悼这位工人出身的中文系的党员。会上，大家哭成一片。当天中午吃炒菜花，吃完我全吐了，此后好多年再也不吃菜花了。

“新人大”吃了亏，准备加强防备，在总部大楼前挖壕沟，拉铁丝网，不让“三红”的人冲到总部来。1968年5月22日，“新人大”正在修工事，突然“三红”的武斗队冲到工地上，手持长矛，见人就捅。有人听见一个武斗队员一边用长矛戳新闻系一年级一个女生的屁股，一边说：“看你以后还能生孩子！”新闻系另一个女生的鼻子也被长矛挑破了。一位农经系的女同学在俯下身子救人时，被一根长矛从后背捅进，从前胸出来，她戴着这根长矛被“新人大”的人送到医院，很快就死了，她也是年青的共产党员。这次武斗中还有好几个人负重伤……。

这几次打死人的武斗对我刺激很大，我对“文革”中出现的许多怪事都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归结为自己阶级斗争观念薄弱，没想到同学中也有这么坏、这么狠的人！

武斗中连续死人，两派杀红了眼，武器也从长矛升级到“真枪实弹”。学校里的工人都是“新人大”的，所以“新人大”就在校办工厂里试做枪、炮和手榴弹。有一次，我们

系一个“新人大”的女同学去北京郊区拉火药，她那天穿的是我新做的一套绿军装，结果路上出了事故，汽车撞到了大树上，火药爆炸，把她炸得浑身是伤，被送进了友谊医院，我们几个女同学轮流去医院照顾她，后来伤虽然养好了，但身上留下不少伤疤，心里更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

北京高校的武斗愈演愈烈，我们学校是用长矛捅死了人，听说清华等高校用真枪实弹也打死了人……。各高校已经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谁也控制不了了。1968年7月，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入高校。宣传队的任务是制止武斗，整风、整党，搞大联合。我大弟弟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学生，他和我都是1965年8月入党。当时，“清华”、“北大”是样板单位，整党先行一步，我弟弟整党时转了正。我问他是怎么过关的？他把整党时写的材料给我看，讲的许多是违心的话。他说：“不违心怎么办，中央已经给爸爸定了性！”我也借鉴弟弟的材料在整党中做了检查，说：开始对“文革”不理解，思想右倾，对老师和同学的造反行动有压制；后来父亲出事了，认为同学们对我的批判很不公平，感到很委屈；现在中央给刘少奇和“61人叛徒集团”定了性，我也应该和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党的孩子，今后要紧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等等。工、军宣队对我很好，他们认为我本质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还算比较顺利地转为正式党员。

按正常学制，我们班应当1969年7月毕业，但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我们依然呆在学校里。人民大学从来没有复课，同学们在学校挖战备防空洞，去农村（苏家坨）整党，很多同学参加了北京修建地铁和建“东方红炼油厂”的劳动，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则去了卢沟桥张百发的建筑工地干活。我整整当了半年灰土工，天天铲石头，有时还背水泥，往搅拌机里送，虽然感到腰酸背疼，早晨起来手肿得攥不住拳头，但能够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本领和学到一些生产技能，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如今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大半生。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是我大学一年级赞助同学回家路费的人之一，他从家里回来后，主动还借我的钱，我坚决不要，他就买了一套《列宁选集》送给了我。“文革”前我们不在一个学

习组，很少来往。“文革”中，我俩观点一致，都是保守派。无论是串联还是“长征”，亦或是去地震灾区救灾，他都和我在一起，渐渐熟悉、相知。在我父亲被打成“叛徒”后，班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像过去那样热情诚恳地对待我，他是其中之一。虽然同岁，他却像大哥哥一样处处爱护我，保护我，使我很感动，因此很自然地由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展为恋人的关系。SM的父亲是一名大连造船厂的老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为了供他上大学，妹妹中断了学业去街道小厂参加工作，妈妈给人家看两个孩子。1968年6月我和系里两个同学及我小妹妹曾与他一起去大连，挤住在他家，天天到大海里游泳。SM家虽然条件很差，睡的是大炕和木板临时搭建的床，用的是煤油灯，有一间屋还漏雨，但他母亲总是想尽办法给我们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他父亲和妹妹也热情相待，我们彼此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们班一个同学到大连出差时顺便去他家做客，在饭桌上对他父亲说：“你的儿子找了一个全国最大叛徒的女儿！……”这个同学回校不久，SM的家里发来了“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工宣队准了他的假。过了一周他回校了，我关切地问：“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我看到了他脸上从未有过的痛苦表情，他竟然点着了一支烟抽起来，这也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他艰难地对我叙述：“我母亲根本就没病，……父亲不同意咱们建立恋爱关系，他认为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劳动人民，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政治污点，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愿意找一个叛徒的女儿作儿媳妇。我中学的朋友也反对我和你确定关系，怕影响我一辈子的政治前程。他们对我没信心，所以把我叫回家。”我听了非常震动，就问：“那你怎么办？”他说，给他父亲反复做工作，但是说不通，以至父亲说出：“你如果不和她断绝关系，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的绝情话。SM也向父亲最后表态说：“你不同意我和太行结婚，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这辈子我结不结婚，和谁结婚，今后你们就管不着了！”他和父亲不欢而散，内心十分痛苦。我听后很伤心，既能理解他父亲的想法，又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明智而果断地说：“你是个孝子，父母生了10个孩子，只养大了你和妹妹两个，我们决不能伤老人的心，一定要尊重他们。我们就不要结婚，以后永远做朋友吧！”这是继父亲被定为叛徒后，命运对我的又一次打击与考验。我虽然很理智，能首先

为别人着想，但感情上却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所幸的是，SM 一直对我很好，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反对而对我们的爱情发生动摇，我深知自己找对了人，能得到这份真挚的友谊和爱情，使我无比感动和珍惜。此事之前，我已经把和 SM 谈恋爱的事告诉母亲，她知道后高兴地说“与工农子弟结合，能弥补干部子弟的不足，大有好处！”她见过几次 SM，印象很好，对我很放心。

1970 年 6 月，人民的最后两届学生（即 69 和 70 届）毕业分配。清华和北大“两校”的这两届学生已经在 3 月先期分配工作，我大弟弟这个清华工物系的高才生，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完全被排斥在核工程物理专业之外，分到了辽宁本溪重型机械厂当翻砂工。这时我们家已基本零散，大妹妹 1968 年（18 岁）夏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853 农场劳动，母亲于 1969 年 1 月去了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这年 3 月 17 岁的小弟弟和 15 岁的小妹妹一起去延安插队。在大弟弟离开北京之前，妈妈回来探亲，她对我们说：“咱们都走了，房子不要了，交给公家吧！”于是，1970 年 3 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北京就没有家了。剩下我一个人，平日住学校，周末就去老邻居谷奶奶（谷牧的母亲）家里。6 月中旬，我们学校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我们系有 10 个辽宁的名额，我想，SM 有可能分到辽宁，他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有人照顾。至于我自己，到哪里都行，一是母亲长期教育我们，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她是为党而培养我们的；二是身为“可教子女”，根本没有自己选择工作的余地。事情也巧，有两个被工宣队动员去新疆工作的同学（是男女朋友）强调有各种困难不愿意去，工宣队就去找 SM 谈：“你是党员，能不能带头到边疆去？”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工宣队知道我们俩的恋爱关系，就把我也分到了新疆。到边疆工作的同学有 30 天的探亲假，我给妈妈写信说去新疆前想到干校看看她。她来信支持我到边疆工作，说“3 月份不是刚见过面吗，不要那么多儿女情长了，快去新疆报到吧！”接到妈妈的信我大哭一场，她还不知道 SM 的父亲不接受我，我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人……。SM 先回家再做父亲的工作，我住在谷奶奶家等候他的消息。在他的耐心说服和他妹妹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做通了父亲的工作，我接到他的电报立即启程赴大连。这一次与他全家的团聚

又伤心又高兴，伤心的是我们远走天边，今后不能时时孝敬辛劳了一辈子的年迈父母；高兴的是 SM 全家终于接纳了我，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边疆携手共进了。

我们这两届学生走了以后，听说是毛主席指示解散了人民大学，他认为文科大学的学生要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习，关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真正的知识。人大的干部和老师大部分去了干校，少部分分到北京其他高等院校。

回想在人民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我的思想变化、行为表现，还是应验了那个规律，即：我自发的认识往往是正确的，一旦改变自己的认识，紧跟上面的指示，反而是错误的。“文革”一开始，我自发抵制，那是发自内心的朴素认知，是正确的；中期，我不断反省自己，批判自己，改造自己，甚至很不情愿地与父亲划清界限，当我跟上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也正是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不像一些干部子弟那样，看出“文革”的荒谬和错误时，按自己的意志办，退出激烈的“文革”，或当“逍遥派”，或冷静地思考和学习。我太投入了，太盲目地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走。因为党和毛主席在我心目中太高、太伟大了，高于我的父母，胜于我的生命。父亲的问题出来后，并没有影响我的革命积极性，总感到我是党的孩子，决不能因为自己和家庭受到冲击从此就消沉。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我觉得逍遥是可耻的、是“逃兵”的行为。我母亲曾劝我：

“你不要去学校了，学校里搞武斗，很危险。”她还多次批评我：“你这个孩子是我们家最偏激的，钻牛角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不服气，反驳母亲说：“你就没有门和的路线觉悟（门合是“文革”中宣扬的一个所谓有路线觉悟的干部）！毛主席说了，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我是学政治的，你应当支持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学习和锻炼！”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批评一语中的，当时头脑太热，根本听不进去。与母亲的冷静和坚毅相比，我感到很惭愧，在我身上，确实有狂热和软弱的一面。母亲始终坚信我父亲不是叛徒，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她完整地保护了父亲的日记、笔记等材料，1969年1月，她是带着父亲的材料和姥姥的骨灰去了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我父亲的老秘书刘叔叔甘愿受牵连，挨批斗，一直坚持说我父亲是最好的人，他把我父亲的大照片放在毛主席像

的背后保存下来，还保存了父亲的大量工作笔记和他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一颗红星》。而我，却烧了父亲的珍贵照片和自己的日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是我遗憾终生的一件事，我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母亲。在此后一生中的任何时候，每当回忆往事，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内心很疼很疼。■

【文摘】

看尽惊涛起落时

——文革记事

冯其庸

在“文革”爆发之初，学校领导接到一份中央调令，要调我到中央文革工作。校党委立即作出决定，同意调我到中央文革去工作，并由副校长孙泱带着校党委的决定来告诉我，动员我去报到。我与孙副校长关系较好，他原是朱总司令和秘书，是孙维世的哥哥，我与孙维世、金山也有过交往，加之孙校长为人朴诚，所以我们比较投合。孙校长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谁也不清楚，学校生怕跟不上中央的形势，你去了中央文革，学校就不至于跟不上形势了，为学校着想还是去吧。我对孙校长说，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去工作呢？何况我担任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门课，一时都停下来，学生会有意见的。但当时是中央的调令，再加上党委的决定，我也不好坚决拒绝。所以我对孙校长说，让我缓一缓，等把课程安排好后再去报到，目前暂时不去。孙校长虽然觉得我讲得也有道理，但还是说你尽快去报到。然后他就回西郊人大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不踏实，实在不愿意去，所以就尽量拖延。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垮台了。不久前，《5·16通知》刚下来时，彭真还召集会议，请理论家和史学家到市委讨论《5·16通知》，同时也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被邀参加了这次讨论。我见到戚本禹也去了，这时大家都还不认识戚本禹，只知道他是史学家，

比较“左”。其实他是江青的同伙，说不定这次到会上，是来摸底的，他在会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会议讨论得很热烈，一致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要求作学术辩论。其实这时连彭真都已被“四人帮”算计了，所以没有多久，彭真就垮台了。北京市委重新改组，由李雪峰任市委书记，人大校长郭影秋任文教书记。郭校长就把我找去，问我去不去中央文革，如果不去，愿不愿意与他一起去北京市委。他是副书记管文教，他要我去负责写社论。“文化大革命”中担任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当然是在风口浪尖上，我去写社论，那等于是在最前沿。但我当时想北京市委比中央文革当然小多了，何况郭校长是我十分尊敬而信任的人，当时我的处境是不去北京市委就得去中央文革，我的打算是尽量往小的单位去，不要到中央文革去，所以我立刻选择了去北京市委。郭校长也很高兴，我也借此摆脱了中央文革。

我到北京市委后，第一篇社论就是《热烈欢呼中央的英明决定》。这是新市委向中央表态的一篇文章，当时写社论的有三个人，就这个题目各自写一篇，由市委挑选后呈报中央批准。我交上去的当天深夜，报社忽然来电话，说社论已经中央通过了，是选的我写的一篇，一字未改，中央还有许多好评，说这篇社论思想好、文笔好，因此通知我赶快到报社去看校样，接我的车已快到门口了。这样我连夜到了北京日报社，仔细校读了排印稿，然后就回家。

第二天一早社论就出来了，当时市委内部一片好评，郭校长为此很高兴。谁知高兴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一周多的时间，这篇社论被江青、康生看到了，说是“右”的思想，加上新市委在其他问题上也跟不上“四人帮”的步伐，所以新市委成立不久，就被打倒了。新市委被打倒后，“文革”的形势越发飞速发展，首都的高等院校以清华、北大为首，已经是闹翻天了，开始是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大、清华一样，造反派已经声势浩大，摩拳擦掌。我当时还在北京市委，我与郭校长商量，我还是先回学校，郭校长也同意我的意见，让我先回学校。哪知我刚回到学校，一夜之间，语文系便满校园贴出批判我的大字报，罪名是“中宣部阎王殿的黑线人物”“反动权威”，后来又上

升到“刘少奇的黑线人物”等等。我当时还只是一名讲师，为了批判我，一夜之间，便把我提升到“学术权威”的位置上。但我心里很清楚，我的学术地位并不会一夜之间提高，只是一夜之间有些人找到了打倒我的借口而已。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在教学上一直挑重担，而且得到了学生的爱戴。还有我不断被中宣部、《文艺报》、《戏剧报》借调出去写文章，早已使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正是最好的一个借口。所以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个以“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的罪名被打倒挨批斗的，与我同时被打倒的还有胡华同志。

正在我被批斗的同时，有一天夜里，人大校园内的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叫声：“郭影秋揪出来了！红卫兵都到广场上集合批斗郭影秋！”其声音凄厉而恐怖。我心想造反派马上要来抓我了，我如果躲开更加不好，不如挺身而出。果然刚想完，造反派就破门而入（当时我已被关押在西郊语文系的宿舍里），把我押到广场的台上，站在郭校长旁边一起挨斗。

之后我的任务就接受系里红卫兵的批斗，同时还要不时在全校批斗郭校长时陪斗。记得系里第一次批斗我时，恰好是一个狂风大雨的下午，我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台下的人衣服也湿了。他们宣布我所有的一百多篇文章都是“大毒草”，他们连毛主席称赞过的文章也忘记了。这时雨愈来愈大，我想这是天在哭，为全国所有被暴虐的知识分子痛哭，为中国文化遭受历史上空前的大破坏、大劫难而痛哭！漫天的滂沱大雨和宣判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却促成我写成了两首诗：

一九六六年六月感事二首

一

千古文章定有知，乌台今日已无诗。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二

漫天风雨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

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

有一次批斗是因为我交给党组织一篇调查报告《回乡见闻》，这是1962年我回家乡探望我母亲时的所见所闻，全是事实。我交给组织后还得到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表扬，说我能向组织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我回家前，党内有过传达报告，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党员外出回来要向党组织反映社会真实情况，这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地区发生灾荒，饿死不少人。由于党的嘱咐，我回来时才会向组织报告。我的报告里说，我亲眼看到我的老家无锡前洲镇冯巷饿死人的情况，亲耳听到了老百姓的议论。我还在报告末尾说明我的家乡是江南鱼米之乡，只要落实党的农村十六条政策，干部的作风廉洁，纠正浮夸风，纠正虚报产量等等，困难肯定是会克服的。

这样一个报告，造反派却说我是反“三面红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我向全系作自我批判认罪。但我手头没有这份报告，我把原稿交给组织后自己没留底，我心里很清楚，我头脑里根本没有反党思想，哪里会写反党文章。土改时，我与我母亲是一户（当时我还未结婚），我分得一亩五分地，我母亲也分得一亩五分地，共三亩地。我从一个真正的农民，如今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我感激党还来不及，哪有可能去反党？所以我就向军宣队提出要看原报告，否则我无从检查。此时军宣队已经进校，军宣队就将我的《回乡见闻》（为批判我而重印的）交给了我，我看到原文后，心里愈加明白和自信了。我就向批斗我的人们提出来，要批判我，要我认罪，必须到我家去，将文章念给当地老百姓听，让他们来批判我，你们要想批判我，这样不是批判得更彻底、规模更大吗？但我的意见他们不接受。实际上是他们不敢去，我家乡的老百姓如果知道我因反映了家乡的困难而遭到诬陷，被打成反革命，老百姓是不会饶过他们的。这时军宣队、工宣队看了我的文章，也都明白了，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这场批判也就不了了之。我因此而重新得到了这篇文章，至今还保存着。

“文革”中的另一件事是有一天夜里，我被学生接走了，当时家里的人都紧张得不得

了，要我多带点粮票。我说不用，我一直爱护学生，学生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就跟着学生走了。出了“铁一号”（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的大门就上卡车，我认识路径，他们的方向是向西郊校园去的，汽车开到半路，有一位学生在我耳边悄悄说：“别紧张，我们是来保护你的。因为知道对立派明天要来抓你，怕你遭灾，我们今天先来把你弄走，名义上只好说是去批斗你。”我听了也很感动，觉得学生还是好的。到了西郊人大，他们就把我藏了起来，对外只说被他们抓去批斗了。接着就是学校两派不断武斗，还死了三个学生。

我大约被关了20多天，运动的趋势又转向了，他们就放我回去，说现阶段没有事了，你回去吧。这样我又回到铁一号的住处。发展到后来，主要不是学生整我，而是语文系的一些同事整我了。他们把我的日记抄走，加以篡改，并摘录重抄，说是我的反革命日记，要我签字承认。我对他们严加驳斥，我说我从未听说过日记是由别人记的，我对自己的日记每个字都负责，对你们抄的“我的日记”我一个字也不能负责。有一次一位教师拿着他们给我改的“我的家庭成分是商人”来通知我，我责问他们土改时我分到一亩五分地，这能是商人吗？他们无法回答。

在这一段时间里传来消息，老舍自杀了，陈笑雨自杀了，还有我的一位中学同班姓朱的老同学也自杀了，而且死得很惨。我听了非常伤心，后来我为老舍补题了一首诗：

哭老舍

沉江屈子为忧国，忍死马迁要著文。

日月江河同不废，千秋又哭舍予坟。

那一段时间，我的家被抄了多次，因为家里只有我大女儿和小女儿看家，我爱人在外语学院上班，家里无人管。抄家时我的多种《红楼梦》都被当作黄色小说抄走了，在西郊人大校园展览，我这才知道家里被抄，也十分担心这股把《红楼梦》当作黄色书抄毁的风

一起，《红楼梦》要遭毁灭之灾。我就赶忙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红楼梦》，每天深夜赶抄，抄了将近一年。刚好在1969年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前抄完，所以我现在还留有一部我自己抄的庚辰本《红楼梦》。

1970年，人大教职员工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火车刚到刘家站时，正值瓢泼大雨，却通知不要下车，直奔南昌，参加挖修八一湖的劳动。于是我们就直接到了南昌，参加了挖掘八一湖湖泥的劳动。当湖泥装满一车（带框的木板车）时，我就负责拉走。这是一项极重的劳动，那时我虚岁47岁，身体还好，加上我在家乡种过十多年地，干过许多重活，所以还能顶住。

在南昌挖湖泥约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到了余江县农村。我们的村子记得叫李下基，住的都是营房式的房子，任务是开山、打石头，使之成为建筑材料；另外就是种茶、采茶，再有到春天农忙季节就是种水稻。这几种活我都很快就学会了。打石头时，我不小心被铁锤打坏了左手大拇指，情况很严重，幸亏医务处的同志很同情我，使劲给我打青霉素，居然没有感染溃烂。种水稻我是内行，学校里大都是北方人，不会种水稻。所以我还帮着教他们拔秧、插秧等。每到早春采茶季节，就是天天采茶忙，我的任务是挑茶叶。茶叶很娇贵，采下来的茶叶不能着地，一着地就会沾泥土味，所以必须一肩直挑到茶场晾茶处，我因为早年在家乡挑过重担，能挑100多斤，不需要停下休息，可以转换着两肩直挑到茶场。这样我又成了专职的挑夫。

但是，在干校，并不是光劳动，还接受定期的批判、作检查。记得一位同志因为晾晒《红楼梦》而引起了一场批判。就我所知，干校先后还死了三位教师，两位是因为江西天气太热，学游泳淹死的，一位是因受冤气愤不过，开木工房的电锯自杀的。这三位都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我那时与别人不一样，我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历史的浩劫，我们赶上了这个历史劫难，除了接受外，无处可躲避，除非是死。但我觉得不值得去死，这要感谢司马迁，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因为不能忍受眼前的冤屈而死，我觉得太不值得了。我无锡国专的同班同学好友朱君用剪刀自杀的消息传来，

我几乎为之痛哭失声，他是精熟历史的历史教员，但却不能从历史中取得鉴戒，我哭他的诗说：

哭同班好友朱君

哭君归去太匆匆，未必阮郎已路穷。

绝世聪明千栽恨，泰山一掷等轻鸿。

未句是既伤心痛惜他，又责备他不应该泰山一掷。所以我当时自己发誓，并嘱咐家里人：我决不自杀，除非被打死。纵然被打死，也是屈死而不是该死，所以我的心态是一定要把这场运动看到底，看它个水落石出，就像我第一首诗说的“看尽惊涛起落时”。终于我在干校时就看到了林彪折戟沉沙的结果，当时我心里暗暗地想我也会看到江青的下场的。我的诗友江辛眉在“文革”中有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说：“江草衰青卧夕阳”。他偷偷给我看时，我微笑点头，心照不宣。所以当时虽然条件艰苦，命运未卜，但我却一直想着将来，我坚信有将来。我下干校时，除抄成《红楼梦》外，还买了不少书。当时不少老教授纷纷把书卖了，我非但不卖，还去把别人的书买回来。我把全部书钉成九个大箱，我说如果真的战争了，那也是天意，但我坚信我会回来的，我仍要用这些书的。所以“文革”中除抄家丢失一部分书外，我还买进了不少书。在干校我也是这个心态，当我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时，我愈觉我内心所预测的或许真要应验了。

三年干校生活，我利用假日两上庐山、湖口、彭泽、东林寺，寻陶渊明、慧远、陆静修的足迹。在星子找到了黄山谷题词的落星寺遗址和周瑜练水军处，用它与史实对勘。我还跑到铅山，想找辛弃疾的坟墓，没有想到虎头门离铅山还有数十里之遥，我只得无功而返。我还在除夕到了桂林，然后又到阳朔，在阳朔坐小船溯流而上，经九马画山，一路风光如画，我心里默默记着将来要把这些山水收入我的笔端。我还利用探亲假到了雁荡山，在永嘉看到了江心寺，想到了近代诗人施叔范《过永嘉江心寺哭文天祥》的名诗。我到了雁荡山谢公岭，遥想六朝诗人谢灵运的风致。还到了大小龙湫，从而领会了徐霞客对大龙

湫的一段特殊的描写。我还利用回北京的机会到了黄山，那时整个黄山没有一个游人，我独自登山，在玉屏楼住宿。因为我到天都峰下时，已是夕阳残照，我趁着没落尽的天光，奋勇独自登上了天都峰顶，正是独立苍茫，满目残阳。我又赶忙下来，再穿一线天上玉屏楼，过一线天时天已漆黑，我是摸着石壁通过的，到玉屏楼已经掌灯，所以服务员说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敢黑夜登山。那次我跑遍了黄山，还意外地找到了石涛当年的古汤池。池很完好，但已被改作仓库。我是碰上他们开仓库取东西，从窗户里看到石壁上四面的题字，进去细看，才发现就是石涛所画过的古汤池。池原在路边，仓库也仍在路边。画中提到的祥符寺，就在旁边，已被改为办公室。但用原地址一对，这几处古迹便可互相对证，确凿无疑了。我还从“人字瀑”中间找到了徐霞客当年登山的古道，因徐霞客书中记到他是从“人字瀑”登山的，至今古代的石级还依然存在，可以确证。

我还利用回京的机会，登了泰山，直上岱顶，看到了秦始皇立的无字碑，还有浔阳张铨的题诗碑，诗曰：“莽荡天风万里吹，玉函金检至今疑。袖携五色如椽笔，来补秦皇无字碑。”诗极有气势，令人不忘。我还看了曲阜的孔庙和孔陵，此时造反派破坏孔庙孔陵的罪证历历在目，依然可见。我在孔庙的东庑看了久已神仰的《五凤刻石》和《孔宙碑》。

《孔宙碑》“文革”中也遭到了破坏，被凿坏了若干字。在邹县孟庙，我还看了名刻《莱子侯刻石》。

三年的干校生活，是我重新干苦力劳动的生活，也是我仍在“文革”中接受批斗的生活，我在人身上和精神上都还未得解放，但是三年干校生活我还是有收获的：一是我好不容易有三年的时间回归自然，朝夕与山水田园相接触，如果没有隔一段时间的批判，几乎是陶渊明般的生活了，何况我们离陶渊明的栗里、彭泽也不算太远，我还到庐山的南栗里去调查过陶渊明故居遗址，到东林寺走过虎溪三笑的遗迹虎溪桥；二是我学会了几种新的劳动本领，如开山打石头、采茶等，这是我以前在家乡劳动所没有的；三是结合我读书调查的癖好，我游览并调查了不少名山大川和文化遗存，大大扩展了我的眼界和胸襟，这对我以后的读书、研究和书画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所以当我离开干校时，还写了一首诗，

隔了几年我再到江西时，还曾去干校探望，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那首诗为：

干校即事

三年从事到江西，手植新桐与屋齐。

门外青山对图画，屋前流水入梅溪。

西崦日落锦为幔，东谷云生玉作猊。

最是村南行不足，红缨花映白沙堤。

我是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的。回来后，到1973年6月，就给我落实政策，“文革”中加给我的罪名统统取消。但我被抄走的全部日记却一本也没有还我，原因是他们在我的日记上篡改了很多，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无法还我，所以由总支书记出面说已丢了，无法找回了，希望我不要计较。事实上我当时要计较也无从计较了。但由于这许多日记的丢失，有不少我的往事，我负债、还债的事，我的诗词作品（的的诗词常写在日记上），还有我与许多学术前辈的交往，就统统无从查考了。

我们刚去干校时，“四人帮”原想把人大留在江西不让再回来了，据说当时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嫌人大老干部多，工资太高，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包袱，所以没有接受。最后人大仍回北京了。这虽是我的耳闻，但回来不久，“四人帮”就宣布人大解散，这说明“四人帮”确是要取消人大的。

“四人帮”为什么要解散中国人民大学呢？许多人都不明白。其实当时人大的教师大都是清楚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人大有一批老教授，老干部是从延安来的，都很了解江青的底细，江青就怕有人揭她的底。“文革”中，人大语文系的黄晋凯同志无意中从资料室所藏30年代上海的报刊上发现了江青当时的情况，因而被造反派狠批。当时“铁一号”传达室的一位老同志是长征干部，因为没有文化，在人大传达室工作，他就多次骂过江青，说她不是好东西。这是我亲自听到过的。所以人大的存在对“四人帮”是一个障碍，让江

青夜不安席。还有曲艺协会的领导陶钝同志，是山东诸城人，与康生、江青都是老乡而且很熟。江青的母亲去世后，还是陶钝帮她料理的。但“文革”中，在江青的授意下，陶钝首先被打倒了。“四人帮”垮台后，文化部组织一批老干部去参观山西大寨，其中有曲协的陶钝同志，舞协的胡晓邦同志，我也一起去参观了，这是陶钝同志亲口给我讲的。所以江青最忌讳的是别人知道她过去不光彩的经历，凡是知道她的底细的人，都会遭到她的迫害。中国人民大学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当然不可能有好命运了。 ■

作者简介：（1924年—2017年），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53年至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任教，后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学家、文艺评论家、书画家、摄影家，本文摘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摘】

在“运动”中如何保持清醒头脑

宋 涛

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不久，中央要求长期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要下放到实际部门里去，了解实际情况。1958年春，我挂职下放到河北安国县当副书记。我亲眼看到了“深挖地，广积粮，大炼钢铁”的种种场面，老百姓却传唱着“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感到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实实在在的大破坏，心疼得很。

几个月之后的秋天，我从安国回来后，就和学校领导李培之同志讲了这些情况。李培之是王若飞遗孀，她说，你可以给周总理写信，李培之说她和周总理是法国勤工减学时的同学。于是，我就写了封信，一封给周总理，另一封给了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把大炼钢铁、深挖地、广积粮的种种弊端都讲了一下。李培之先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在得到总理允许后，晚上八点多钟我和李培之一起去中南海把信面呈总理，并向他倾诉了我对“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总理就到安国视察了。

总理到村里百姓家，摸摸炕，是凉的；到了县委办公室，地方领导汇报完情况后，周总理问我，宋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只好说：“没有，有些已经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就问县委书记：“这里的群众怎么都不烧炕呢？”他回答说今年不怎么冷。总理于是反问他，为什么你这个房间烧了炉子？县委书记也没办法回答。吃完饭后，总理和我一起走，到地里去察看情况。一直到现在我心里对总理都很敬重，总理真是好，他是那么朴实，实事求是。总理去世那天我非常悲伤地哭了。

1959年，中宣部组织我主持编写批判赫鲁晓夫和“反修”的文章，文章写完交给中宣部后，还安排我们几个同志去东北参观考察。从黑龙江到吉林后，就学校来电报让我立刻回京。回来后的第二天，有人通知我，说我是“右倾”，是“三反”分子，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我写给河北省委书记的信被转给北京市了，当时的北京教委主任主持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会批判我，学校接着也开会批判我。直到当年12月15日，批判才停止。

1960年3月份，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和中宣部副院长部长周杨同志为此专程赶到我们学校，胡锡奎等几位副校长主持了会议。他们两人说，宋涛同志怎么会是反党分子呢？他年轻时就参加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参加革命，是很进步的一个同志。就这样我又被恢复了工作。

“文革”开始后，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个被贴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宋涛是什么人？》，顿时校园就轰动了。从那以后，学校的大字报就遮天盖地了。贴我大字报的那个研究生，文革后向我道了歉。我说你们年轻人对时局没有认识，我不怪你们。实际上，批斗过我的人，很多是迫于无奈和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才去做的，我不怪他们，我还是把他们当同事，朋友看。我觉得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对实际情况的清醒认识，这样才能经得起风雨。

1969年4月，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但我还是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认罪，因为无罪可认。1972年底，军宣队宣布，宋涛没有任何问题。我作为最后一批被解放的人员回到了北京，因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解散，我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

师大那里，我被恢复了教学工作 and 经济系主任职务。

我的家人因我而受到牵连，遭受了无尽的痛苦，儿子女儿都没有很好地上学。儿子宋强高中三年级，毕业没能升学就下放了，女儿宋文力是在高二时被下放到了河北。他们上学时成绩都很优秀，他们也是在我下放回来后，经组织推荐才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后来一个在化工厂工作，一个在北京科技大学教书。■

作者（1914年12月~2011年2月9日）安徽利辛人，经济学家，曾在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本文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求是园名家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摘】

“四清”归来，我直接进了“牛棚”

方汉奇

等到“四清”运动快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我是1966年7月回来的，从农村生产队回来之后就直接进了“牛棚”。那个时候原来的领导已经被“靠边站”了，造反派当权了。我们新闻系那里在人民大学西郊校园南一楼（今品园楼一楼、二楼那个位置），是座两层楼，学生宿舍，资料室，党政办公室都在那儿，我们的“牛棚”也在那儿。

所谓的“牛棚”就是找一个教室把我们集中关起来，吃住学习都在里边。当时学生和教师，以学生为主，组成革命委员会，已经停课闹革命了。“牛棚”里面关了不少系的领导和骨干教师、问题教师，系领导都成了走资派。我是因为社会关系、历史问题被关起来的，这些问题和关系其实都是思想改造的时候自己写的和交代的，但也因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当上了“牛鬼蛇神”，住进“牛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好40岁，身体最好的时候，干起活来是强劳力。我的体会是知识分子只要体质好，过劳动关并不难。相对地说，劳动人民过知识关要难得多。那一段时期，再苦再累、再脏再重的活儿都没问题。一个是思想上有那种自觉：知识分子要改造，要和工农结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这是建国以后接受的思想意识，有这种主动的要求，对劳动并无抵触情绪。另外劳动本身也是件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三九天”都在户外干活。西郊人民大学的所有下水道我都钻过，所有的房顶都上过，打扫卫生，扫厕所，再苦再累再脏的活都不在话下。

文革中，革命群众在打派仗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就被搁置一边了。两派之间互不来往的，但我们这些老牌的“牛鬼蛇神”倒是可以两边走动。因为两边的“革命群众”都认识。比如新闻系的办公室在南一楼，这里属于一派的地界。新闻系老师学生的所有信件、报纸都送到南一楼。而另一派地则在中间线北侧，他们就拿不到属于他们的信件报纸。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就可以当信使，每天为两派“革命师生”送报送信。两派都不拦我们，因为这些是他们的需要；要拦的话，就没有人送了。

我就游走于两派之间，在职工食堂（现在艺术学院那个地方）吃饭，然后到南一楼劳动干活。这种情况维持没有多久，军宣队，工宣队入驻，两派武斗告一段落，稍后学生一分配，学校基本上就没人了。接着人大的教师干部就开始下放五七干校了。

1969年11月，我作为第一批“五七”战士去了位于江西余江的人大的五七干校。下去时报名很踊跃，除了老弱病残基本上都下去了。五七干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起来的。旧的学校已被砸烂砸碎了，道路已经走不通了，知识分子就只能到工农那里去接受再教育了。所以去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思想障碍，觉得走这条路是很自然的，去干校的时候是下了决心连锅端的，全家都下去了。原来我住在林园2楼，房子都退了，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都带下去了。人大的后勤和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人连没用完的蜂窝煤都带了下去，还组织了专列；包括铁路运输在内，当时一切都是服从政治运动。

在干校的第二年，我们曾听说人大“五七”战士要在江西就地分配，又听说有关方面

的领导曾为此和江西方面谈过，但没有被接受。一个理由就是人大的人级别太高，工资太高，江西承受不了，没法安置，人大的干部职工和教师有很多是从陕北公学、华北大学过来的，级别有的比省里的领导都高，省里不好安排，也安排不起。再加上当时的校领导，包括郭影秋、崔耀先他们有这么一个考虑：就是这支队伍不要打散，按编制整个序列地分割到几个学校，以便在适当时候重整旗鼓、卷土重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远见，事后证明这个安排是正确的。这个队伍只是稍有流失，个别人自行脱离人大，各奔前程。多数人像我们这样整个建制地下去了，整个建制地回来了。

当时下干校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觉得能在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风浪中苟全性命就已经不错了，不必考虑再搞教学、研究那些营生了。当时觉得当工人、当农民也挺好的。可能有一些老干部、一些在党内已经有较长革命经历的，他们会有一些想法，而像我们这样的没有。因为当时我们这样的“牛鬼蛇神”在政治上早已沦为贱民，一切听从安排，不敢有非分之想，只希望整个国家好、大家都好。■

作者 1926 年出生于广东普宁，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本文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求是园名家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摘】

漏洞百出的大批判

高 放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而挨批挨斗。

造反派为了给我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就把我于 1956 年曾经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等观点拿出来事，还几次抄家，但都找不到什么新证据。于是他们

就指责我曾参与撰写的50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本中，为什么只引用毛主席的两句话？其实当时编书时，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有统一规定：只引用毛主席对某一历史事件的直接论述，不必引用毛主席对一般原理的论述。按照这个规定，所以我们只引用了毛主席直接论述辛亥革命的两句话，而这一部分恰好就是由我分工撰写的。如果说我贬低了毛泽东思想，那其他参与撰写的十几位同志连一句都不引，岂不更贬低了毛泽东思想？可见这种批判完全是强词夺理。

红卫兵到我家抄家时，看到我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摆满了大书架，而把《毛泽东选集》另放在靠近我书桌的小书架中，就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选集》另放在小书架中？这不是贬低毛泽东思想吗？”我机智而又如实地说：“因为小书架靠我办公桌近，我要经常拜读、查阅毛主席的著作，这样顺手取书很方便，何必起身再到大书架上去拿。”“文革”中诸如此类毫无道理的乱批判、大批判的事例不胜枚举。

尽管我靠边站，被强制劳动，甚至被关押拷打，我依然万分关切党和国家的命运。我尽可能地在校内并到北大、清华等高校看各种大字报，采购各种小报和有关资料，还同几位信得过的同志时常交流各种见闻。种种异常情况迫使我深沉思考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但是在那种翻云覆雨的气候下我只能是敢想不敢说。那时不乏儿女揭露父母、妻子揭发丈夫的事例，所以有许多疑问和想法只好自己关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自问自答。

我读过老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中有一篇是1930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收入解放后出版的《毛选》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题解中只笼统地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其实信中批评的明明是林彪的观点，当时我就想，这怎么能够说林彪“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呢？这岂不是伪造历史的不实之词吗？

1967年元旦我从西郊校园骑车进城，沿途到处看大字报，西单十字路口居然有这样一条横幅标语：“欢呼毛泽东纪元元年到来”，我只好暗自发笑而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摇头。

当时还买到一本《刘步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其中把毛，刘二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而提出的观点掐头去尾排列在一起对照。我读完之后就想到：按照这种做法，岂不是可以另编一本《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吗？

1969年我恢复了组织生活之后，1970年至1972年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三年。那时江西在穷山沟里修建共产主义新村的做法和林彪的乘飞机逃跑坠毁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我校国际政治系的教工都合并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在这里我教了工农兵学员五年。除了国际共运史和经典著作外，还教过哲学课、经济学课。这时我还同工农兵学员一起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1976年1月8日从广播中惊悉周恩来总理病逝时我从来没有那么悲伤地失声痛哭，深感折此栋梁，国家和党危难更重。最痛苦莫过的是当时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思想。在给学讲哲学时，开列了普列汉诺夫的名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只能含蓄地要学生特别注意读此书第六章。其中写了这样引人深思的历史教训：法皇路易十五宠爱贪求虚荣的彭帕杜尔夫人，而这位宠妃大力支持庸碌无能的苏俾兹将军，因此使法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处于劣势，打了败仗。可见，平庸的人，尤其是贪求虚荣的女人能在历史上起到重大的消极作用，是因为有皇帝的宠信这个特定的社会条件。有的老朋友对我这种煞费苦心的巧妙讲法交口称赞，但也捏了一把冷汗。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又回到人大执教。1979年人大党委复查了过去对我的批判和处理，终于予以彻底平反。■

作者简介：1927年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社会主义学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本文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求是园名家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时期部分死难者简表

姓名	单位	职业	性别	死因和时间
王裕国	校党委	工作人员	男	文革初期在人民大学西郊校区林园九楼跳楼自尽。
郭海云	总务处	工作人员	男	文革初期投运河自尽。
王命先	计划统计系	资料员	男	王稼祥之子，文革初期投运河自尽。
杨 俊	附属中学	老师	男	1966 年 8 月被殴打死。
郑之万	附属中学	老师	男	1966 年 9 月跳楼自尽。
张云英	档案系教师 陈兆祺之母	无业	女	1966 年 8 月从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红一楼甲组 5 号被遣返回乡上海嘉定县娄塘镇，9 月 8 日遇难，公安局称投池自杀，文革后县检察院和法院疑为他杀。
阚玉瑶	政治经济系	俄语教师	男	因其妻林莉（林彪侄女）被江青诬为苏修特务，1966 年 9 月 7 日在人民大学西郊校园宿舍自缢身亡。
孙 泐		副校长	男	1967 年 10 月 6 日，在关押的人民大学西郊校园图书馆地下室遇难，有说自杀，也有说他杀。
许惠尔	编译室	翻译	男	1967 年 8、9 月间，身为“摘帽右派”，因为出售文革各种小报，被抓住反剪双臂，随后被毒打致死。

刘 燕	总务处	会计	女	1967年11月被批斗后，在张自忠路三号人大宿舍红二楼丁组2号家中自缢身亡。
蒋荫恩	新闻系	副系主任	男	1968年4月在人民大学西郊校区被关押时自缢身亡。
何思敬	法律系 哲学系	系主任	男	1968年4月14日，法律系何思敬教授被关押在人民大学西郊校园北二楼，被殴打致脑溢血，逝世于积水潭医院。
吴景超	计划统计系	教授	男	1968年5月7日遭受残酷迫害后逝世。
李尚公	中文系	教师	男	1968年12月27日在人民大学西郊校园语文系办公楼自杀，一根烧红的通条直刺心脏。
阮 季	历史系	教师	女	尚钺夫人，1968年12月15日在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家中洗澡间悬梁自尽。
何干之	历史系	系主任	男	1969年11月16日，经历长期毒打和迫害后逝世。
项 冲	政治经济系	副教授	男	1970年5月2日在江西余江刘家站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仰药自尽。
杨树贵	总务处	会计	男	1970年在江西余江刘家站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怀疑贪污，独自进入电锯房，将头冲向电锯以致头颅劈开而亡。
杨承祚	政治经济系	教授	男	1967年7月15日，与妻子袁绍英突然被拘捕，原因为杨承祚曾是辅仁大学教授，与王光美相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70年2月3日的《关于杨承祚死亡报告》中写道：“杨承祚病情时好时坏。1970年1月19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

				1970年2月3日8时03分死亡。”
陈秋梅	政治经济系	教师	男	1970年在江西余江刘家站人大五七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时，用刀片自杀。
王锡中	语文系	学生	男	1968年5月11日，人民大学爆发第一场大的双方冲突的武斗，5月15日夜，王不幸身亡。
陈荣祖	计统系	学生	男	1968年5月22日人民大学在图书馆楼西南的空地上发生武斗，当场身亡。
廖金妹	农经系	学生	女	1968年5月22日人民大学武斗罹难者。
杨大志	农经系	学生	男	1968年5月22日人民大学武斗罹难者。
沈士根	经济系	学生	男	1968年5月22日在人民大学的武斗中被长矛刺穿左眉眶骨入颅室7公分，瘫痪半年后不治身亡。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记忆》的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邮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